

大衆知識叢書



軍事辯證法

郭化若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大眾知識叢書

軍事辯證法

郭化若著



郭化若

新華書局出版

大眾知識叢書

軍事辯證法

著者 郭化若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福康里三號

總經售 聯營書店

1949年12月初版(滬)
1950年1月再版(滬)
1951年3月三版(滬)
1951年9月四版(滬)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三版自序

這本小冊子有點出乎意外，以致在再版時沒有加序，也沒有校正錯字。現在似乎應該說兩句話了。這本小冊子原名『軍事辯證法之鱗爪』，因為它既不是『軍事辯證法』的骨髓，也不是全貌，只是一鱗一爪而已。出版時一看，封面寫的卻是『軍事辯證法』，不禁使我吃了一驚，書名雖然響亮，但這種大模大樣的態度，不免有『目空一切』的嫌疑，後來想想，這大概是朋友或書店的好意，也就算了。不料這樣響亮的書名倒有好處，居然又要出第三版了。這裏不能不聲明一下，以免讀者見責。

軍事思想戰線上的鬭爭與其他哲學問題的鬭爭一樣，也是辯證唯物論與唯心論、機械論的鬭爭。反動軍隊與反動將軍們「照例」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唯心論與機械論。（一般說來，戰略上多犯了唯心論的錯誤，戰術上多犯了機械論的錯誤）只有人民的軍隊，進行正義的戰爭，並且要在先進的無產階級的

政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產生正確的戰略與辯證唯物論的軍事思想。而這種正確的戰略與辯證唯物論的軍事思想又反過來指導這種正義戰爭，而取得勝利。反動的軍隊，進行不正義的戰爭，不能產生正確的戰略與正確的軍事思想。斯大林大元帥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指出希特勒德國戰略的錯誤：『照例是對於對方的實力和可能性估計不足，對於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同時又指出德國戰術的錯誤：『他們的戰術是極爲刻板的，因爲它總是竭力把戰場上的事變去遷就這一條或那一條條令。當形勢允許實現條令上的要求時，德國人在自己行動中是精確和準確的。他們的力量就在這裏。當形勢變化和「不符合」這一條或那一條條令的時候，需要採取不是條令所規定的獨立決定的時候，德國人便變得無能了。他們的基本弱點就在這裏。』（一九四三年紅軍節最高總司令命令）遠的姑且不說，只說近的。我們從八年抗戰四年解放戰爭和最近在朝鮮的抗美援朝的經驗中都證明了上述的論點之完全正確。日寇的進攻我國，蔣匪之進攻解放區，在戰略上都『照例是對於對方的實力和可能性估計不足，對於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也就是說他們戰略的出發點，不是根據雙方實力和可

能性的客觀力量的對比出發，而是根據自己主觀上侵略的願望出發，所以都碰了釘子，都得到失敗的結局。而最近美帝國主義者對朝鮮的侵略戰爭，「照例」又重覆了希特勒、日寇和蔣介石所犯過的錯誤。又「照例」是對於對方的實力和可能性估計不足，對於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在戰術上，日寇重覆了希特勒匪軍的「刻板」，蔣匪軍同樣重覆了這種「刻板」，又加上特有的腐敗；美帝侵略軍則不但「照例」重覆了德、日、蔣等的「刻板」的錯誤，並且更機械，更「刻板」，因而也表現得更「無能」。因此它的海空軍的「優勢」，絕無法挽救陸軍的最後失敗與覆滅。

這種戰略上唯心論，戰術上機械論的錯誤，是反動軍隊特有的屬性，除了很小的形式上與程度上的不同外，古今中外都「照例」是一樣的。反動軍隊進行反人民的不義的戰爭，既然注定要失敗，而它在戰略上在軍事思想上，這種屬性這種錯誤，也是永遠不能改正的，一直發展到它們的滅亡。美帝侵略軍在朝鮮的新的失敗，恐怕比這本小冊子的銷售，還要快些，還要「多」些。

在研究兩種性質上根本不同的軍隊與兩種性質上根本不同的戰爭時，提到

哲學上來研究兩種性質不同的軍事思想，對於我們觀察中朝人民抗美援朝的發
展，特別是在這種發展遇到曲折時，將有幫助，可使我們能認清戰局，堅定信
心，而不為謠言所誤。

郭化若 一九五二，二，十三夜

自序

還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研究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九四〇年八月爲了推動新哲學的研究，籌開第一屆「年會」，年會籌備會分配我做一個報告，題目被指定爲：「軍事辯證法」，當時真有點「誠惶誠恐」。因爲我於軍事上既是一知半解，於哲學上更是個初發蒙的小學生；但既然被分配了這項工作，就只好勉強努力。搜集了一些不完備的材料，湊成一個提綱，做了一個報告。報告提綱也就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三卷一期至四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四月）中陸續發表出來。這個報告是試圖把當時抗戰中所發生的軍事上紛紛的議論，提高到思想上哲學上給予以批判，駁斥抗戰中的軍事上的唯心論與機械論，幫助團結抗戰的宣傳。雖也明知錯誤幼稚在所難免，但爲爲人民利益而獻醜，終比爲個人保身而藏拙有益；且亦可藉此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海內先進把唯物辯證的軍事學的作品多寫些出來。這一工作當時得到新

哲學會負責人艾思奇、陳伯達、何思敬、及已故的和培元等同志的鼓勵與幫助很大。

後來蘇德戰爭爆發，緊接着全世界形成了反法西的統一戰線，蘇聯紅軍大舉反攻，打敗法西斯德意匪軍；並轉師東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的偉大勝利。不久在我國又開始了偉大的解放戰爭，並由戰略防禦經過戰略反攻到戰略進攻，並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中間豐富的戰爭實踐，提出了比過去抗戰三年中所提的問題多得多。就使得過去的往事，不但早成「明日黃花」，而且相形之下，也已經是渺不足道的了。可是我也從那時起就一直沒有提筆寫作的機會。

最近各處軍政學校招收了大批新生，還有許多解放軍官也在學習，到處都有軍事參考書的需要，有的同志勸我把這舊作出版，我自己明知這相淺的過時的東西，沒有實際作用，早應拋之字紙簍中，所以辭之再三；但又想到既然有人需要，有個粗淺的總比沒有好。沒有粗淺的作引路，珍貴的精深的東西是不易出來的。所以最後還是同意把它印出來，供初學軍事理論與校正舊的軍事思

想的參考；並藉此來紀念已故的老友我們底青年新哲學家和培元同志。

本文起草於蘇德戰爭之前，當時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敵後進行游擊戰，全國還處於戰略防禦至戰略相持階段中，因此文中對運動戰規定爲不包舍陣地攻擊的運動戰，對殲滅戰規定爲分散的殲滅戰，在當時會是正確的。今天（在我軍舉行戰略進攻的時候）情況已大大改變，我們已進行過並正進行着包舍陣地攻擊的運動戰，與大規模集中圍殲的殲滅戰。這是應該訂正的。其次本文寫於整風運動之前，學風與文風的缺點尙未清算，錯誤自然不少。本文雖然搜集了許多材料，給予當時軍事上的唯心論者以批評，特別對當時蔣介石高唱的什麼「革命戰術」、「新戰術」（見「參謀長會議」與「柳州會議」講話）及閻錫山的什麼「革命戰法」，給予以主要的批評（當時因團結抗戰關係，所以對他們的批評都未指名。現在爲保留原來面目，故未修改），希望推動他們領導下的軍隊積極抗戰。但只是把軍事思想，提到哲學上，給予以初步批判。由於作者在哲學上是個小學生，所以在哲學範圍內的「索隱鈎深」未能做到，更談不上有什麼發揮。本文又是以當時「大後方」的讀者爲對象，是作爲軍事宣傳而寫

的，所以未顧及本軍（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需要。有人說：這個東西「太膚淺了！」有人說：「這不適合我們八路軍幹部的需要。」……實在的，毛病太多。不過，光着屁股在地下爬的相片，總還是童孩時代真實的留影，況且，每一個人都要經過這個階段，並且每一件事，也都必須經過這一階段，我想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看法。因此，本文實在只能當作初學軍事理論與校正的軍事思想的參考，不能賦予奢望。其中個別的缺點與錯誤，也還不少。所望軍事上哲學上的先進與所有讀者，不吝賜教！

化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於上海

目次

三版自序

自序

第一部份 關於戰爭的辯證唯物論

一、戰爭的本質

二、戰爭與經濟的關係

三、戰爭與政治的關係

四、戰爭發展的規律

第二部份 關於戰法的唯物辯證法

五、戰略戰術之差別性與同一性

六、戰略之全局性與戰術之局部性的關係

一——三八

一

一

三一

三五

二九——九七

三九

四三

- 七、戰略戰術之鬭爭形式與軍隊之物質內容的關係……………四五
- 八、戰鬭力中的多樣矛盾及其利用……………五四
- 九、時間與空間……………六四
-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滲透與相互推移……………七四
- 十一、由戰略防禦到戰略反攻是戰力量變到戰略質變的鬭爭過程……………八五
- 十二、在判斷情況中辯證法之應用……………九〇

軍事辯證法講話

——用唯物論辯證法來看軍事上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部份 關於戰爭的辯證唯物論

一 戰爭的本質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首先來研究「戰爭是什麼？」這一問題，也就是批評各種對於戰爭不正確的定義，提出正確的定義來。我們反對資產階級學者把戰爭賦予永恆性的觀點，也反對「和平主義者」空談廢止一切戰爭的虛妄。我們反對從表面上觀察戰爭與區別戰爭，主張從戰爭本質上區別戰爭，而定出我們對不同戰爭的不同態度。

資產階級學者們、將軍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說明戰爭是隨人類社會一同發生而不可消滅的，是人類天性的產物；有的更說現代的戰爭與資本主義制度

沒有關係，不可責備資本主義。他們有意的掩蓋戰爭的真實本質與政治目的，所以僅從表面上現象上說明戰爭，給予戰爭以歪曲的或片面的定義。有的說：『戰爭凶事也，然戰爭又爲生物學上進化之一法則，……人間一切之進步悉存於個人并國家間之競爭，此競爭漸成爲戰爭，即戰爭之興起，乃必要且不可避免之天則。……所以不許以個人道德否認戰爭也。』（日·中澤三夫：戰爭）有的甚至於說：『戰爭者萬物之父』（本哈特），『人生而無戰爭，世界即成死灰，成乾土，獨爲唯物論者所佔有而已。』（毛奇）這些資產階級的戰爭歌頌者之詭辯，主要的在企圖證明戰爭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東西，因而資產階級之爭奪殖民地與霸權的戰爭是合理的，因而勞苦大眾應該擁護這種帝國主義的戰爭。他們這種錯誤的定義，主要的是因他們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不能不這樣撒謊。此外在認識上說，還因爲不能（或不願）用歷史主義的態度觀察問題。列寧早於一九一九年告訴我們：『在社會科學問題中最可靠的，是要真正養成正確地對待此問題的習慣所必要的，在瑣碎事情的汪洋中或在鬭爭意見的五花八門中，要做到不茫然自失所必要的——從科學觀點，來對待問題最重要

的，——這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的關聯性，觀察每個問題要從在歷史上怎樣發生了某種現象，這種現象在他的發展中經過了什麼樣的主要階段的觀點來觀察，同時從他發展的觀點，來觀察現存事物爲什麼要變得現在這樣。」（列寧：「論國家」，）根據這種指示，去研究歷史上的戰爭，就可看到戰爭僅是階級社會的現象，它隨私有制度、階級與國家之產生而產生，它只限於一定的歷史範圍裏邊，原始共產社會沒有戰爭，將來資本主義社會剷除，階級消滅，戰爭也將永遠消滅。「戰爭——作爲一種歷史的現象——的原因，不是在於人類的「壞根性」，不是政府底「不良政策」；而是在於社會之劃分爲階級，劃分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如果階級消滅，剝削制度不復存在，則戰爭也沒有發生的根據，這難道還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所以僅僅從現象上去觀察戰爭，不能得出正確的定義。

怎樣才能得出正確的定義呢？

我們知道科學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任務，就在從外的現象深入事物深處，發現出裏面最一般的最主要的東西，它的根基它的本質來。列寧告訴我們說：

「辯證法要求我們從發展上對所與的現象，作全面的研究，要求我們把外在的東西、假象的東西還元於根本的起動力，還元於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鬭爭……」『我們看到從一個向另一個的轉化和轉調，本質現象出來，現象是本質的。人類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第一秩序——假使這樣說——的本質，到第二秩序的本質，這樣無限地深入進去。』（列寧：「哲學筆記」）這樣我們要認識戰爭，就應該從戰爭的一般現象——暴力行爲——中，深透到戰爭裏面發掘出戰爭的本質來，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定義。

戰爭的本質，爲資產階級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克勞什維茲所發掘出來，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定義列寧評價爲：『其根本的思想現在毫無條件地乃爲一切有思想的人們之收穫』（列寧，錄自「戰爭論」俄文版序文）。在別的地方列寧說到：『運用到戰爭上，辯證法的基本命題……在於「戰爭簡直是政治之用別種手段（即暴力的）的繼續」。這就是戰爭史問題上偉大的作家克勞什維茲的公式，其思想是受黑格爾的薰染的。這正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觀點，他們把每一個時候每一種戰爭視爲當時有關各列強或其內部各種階級

之政治的繼續」(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譯文見「馬列主義論戰爭與軍隊」五頁)。

定義之正確，就在於它能指出事物的本質來，例如列寧給帝國主義的定義爲：「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史大林給列寧主義下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史大林選集」第二卷一頁)。

這些都是指出本質的說法。

毛澤東同志給予戰爭以天才的定義，他說：「戰爭——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之矛盾之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這種定義是否正確呢？我以為這是正確而完善的定義。因爲它指出了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社會的歷史現象，那末它就將隨私有財產、階級與國家之消滅而消滅，並不是人類社會不可分離的隨伴者。因爲它指出戰爭的本質是一定發

展階段上的階級鬭爭的最高形式，那末，不是任何矛盾，不是任何時候都會發生戰爭。而在這最高鬭爭形式之外，不能否認其他的鬭爭形式，相反的還應該與其他鬭爭形式相配合。

我們把戰爭的本質發掘出來，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反對戰爭的歌頌者之宣傳與歌頌反革命的戰爭，我們也反對所謂「和平主義者」之反對一切戰爭。

我們要發掘出戰爭的本質，根據此本質的區別，才能確定我們對各種戰爭的應有態度。

怎樣發掘與判定現代具體的戰爭的本質呢？列寧早於一九一六年告訴我們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必須研究戰前的政策，研究這勢必引起而且已經引起戰爭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國主義的，換句話說如果政策擁護財政資本底利益，掠奪和壓迫殖民地和其他國家的，那末從這個政策中產生出來的戰爭，就一定是帝國主義戰爭；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性質的，換句話說如果政策是代表反民族壓迫的羣衆運動的，那末從這個政策中產生出來的戰爭，就一定是民族

解放性質的戰爭。」（列寧：「論民族戰爭評克葉夫斯基」）

在一九一五年，列寧也曾說過：「恰恰相反，在中國、波斯、印度以及其他許多不能獨立的國家中，我們則在近十年來看到了幾千百萬人們覺醒起來，爭取民族生存，而由反動的列強壓迫之下，求得解放的政治。在這種歷史基礎上底戰爭，就是現在也可為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解放的戰爭。」（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

把戰爭的本質揭發出來，也就是把戰爭的真正的政治目的暴露出來，就能揭破資產階級的欺騙，而決定我們的態度。帝國主義戰爭是「擁護財政資本底利益」（列寧），「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別的人民」（「聯共黨史」第六章），所以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無產階級革命戰爭是爲了「推翻資本家地主的剝削者」（列寧）或者是保衛社會主義的蘇聯；民族革命戰爭是「代表廣大的羣衆運動而反對民族壓迫者」（列寧），這兩種戰爭「其目的或是在於保衛人民，防禦外來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圖，或是在於使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或是在於使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

來。「——聯共黨史」第六章），所以都是解放的非侵略的正義的戰爭。根據這些戰爭的本質與其政治目的的區別，我們對戰爭的態度不是一律反對也不是一律贊成。我們對於正義戰是贊成的、擁護的、以至於犧牲一切堅決爲這正義戰的最後勝利而戰鬥到底。如我們在抗戰中的態度一樣。我們對於非正義戰爭則堅決反對之，直至以革命的戰爭來消滅反革命的戰爭。日寇侵華的戰爭是繼續其帝國主義的政策，所以我們必須以正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來反對它。

我們不因戰爭給予人民以災難而反對一切戰爭。聯共黨在一九〇五年即指出：「……不能離開歷史意義來看戰爭。對於它，沒有絕對的災難，正如沒有絕對的幸運一樣，……它應該從它底階級——無產階級——底利益，從它的發展和解放底利益的觀點，去看和去估計戰爭的意義。它對於戰爭的估計，應當不是憑犧牲者的數目，而是憑它的政治結果。階級底利益一定要高於因戰爭而犧牲和受苦的個人利益。而且如果某一戰爭服從於無產階級底利益，如果它服務於無產階級全體的利益（對於中國則是民族利益，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作者），如果戰爭解除他們一部份的束縛，給予他們鬭爭和發展的自由，那末這

樣一個戰爭，就是一個進步的現象，儘管它會帶來犧牲和痛苦。」（「無產者」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四日）。

我們不以「進攻」「防禦」來區別戰爭的性質，蘇聯的防禦推進到卡累利亞地帶進行，並不影響其正義戰之性質；同樣，如果印度民族起義進攻英國的軍隊，或是印度人民武裝起來進行游擊戰爭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壓迫求印度的民族解放，將也是革命的戰爭。

我們對消耗戰與殲滅戰，持久戰與速決戰，只看做是戰爭一個側面的區別，不是戰爭本質的區別；雖然在一定條件下，這個側面是主要的。例如我們抗戰已經開始，正義戰或不義戰的問題，已不需長談，而主要的問題，乃是中日戰爭是什麼樣的戰爭（戰爭的本質外各個側面）？為什麼？怎樣辦？這時回答這些問題，提出最主要的特點，側面——「持久戰」，是必要的。所以有「論持久戰」一書，而無「論正義戰」一書，其主要的目的在於使全國人民了解當前所進行的戰爭是什麼一會事，其發展前途如何？怎樣才能勝利與解放。

所以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告訴我們：「……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

革命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反革命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反革命戰爭，但是單單不反對進步的革命戰爭，對於後一類的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反革命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開始反對。我們中國則從政府到人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主力軍到游擊隊，一律舉起義旗，進行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到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着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永久和平與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

這就是我們對戰爭的認識與態度。這種認識與態度，同唯心論與機械論顯然地不同。

我們的研究就這樣開始。

二 戰爭與經濟的關係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要研究戰爭怎樣依據於經濟，又怎樣反過來影響經濟；我們一方面反對像杜林那樣唯心論的見解，把政治暴力看成是首先的原素，歷史的基礎，而把經濟看成是第二秩序的東西；另一方面也反對「潛在武力論」者瓦爾特等機械論的見解，無視戰爭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上面講過，列寧指示我們：「辯證法要求我們從發展上對所與的現象作全面的研究，要求我們把外在的東西、假象的東西還元於根本的起動力，還元於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鬭爭。」

杜林的「特出」的命題：『政治關係的形式是歷史的基礎，經濟的附屬關係……是第二秩序的事實……首先原素卻應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應該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恩格斯：「反杜林論」抗戰書店訂正版二〇九頁）。杜林爲了證明這一命題，還舉出兒戲似的例子，說魯濱孫在孤島上「手握利劍」奴役了禮拜五，以證明「暴力」可以產生「財產」。恩格斯反駁

他說：「就在幻想的魯濱孫的島嶼上，利劍也從來不是從樹上生出來的，……如果魯濱孫能夠獲得利劍，那末我們同樣有根據可以設想，禮拜五也可以在一個清明的早晨，握着實彈的手槍走出來，那時全部的「暴力」關係被顛倒過來了！禮拜五居指揮地位，而魯濱孫則不能不用全力來工作。」可見「暴力不是單純的任意的舉動」而「需要某種工具」，「所以暴力的勝利根據於武器的生產，而武器的生產則本身又根據於一般的生產，所以也就是根據於「經濟的力量」，「經濟的情況」或軍事力量所擁有的物質手段」（同書二百二十頁）。接着恩格斯又指出：「……暴力的工具……需要「不可勝計的金錢」。但是暴力本身不能造出金錢，最多它只能奪取已經造出的金錢，可是在這上面它也不是時常能夠收效的，……所以歸根到底，金錢還是要從物質生產上去求得的，這樣力量還是要用經濟情形來決定的，因經濟情形供給它以製造及保藏鬪爭工具的資料，但是還不祇如此，任何東西都沒有像陸軍與海軍那樣厲害的依靠經濟的條件，武裝、編制、組織、戰術與戰略，首先就要依賴於當前所有的生產與交通工具發展的程度。這上面起革命作用的，不是天才指揮官的「自由理性

的創造一面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及活的士兵成份的變更；天才指揮官的影響，最多祇能使戰鬥的性質適合於新的武器和新的戰士」（「反杜林論」訂正版二一〇及二二一頁）。

由此可見「暴力只是一種手段，其實際的目的是經濟的利益。目的比較那種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基本」得多；同樣的歷史上關係的經濟方面，也比較政治方面要基本得多」（同書二一二頁）。

我們再從歷史上來看：

在原始共產制的社會裏，沒有剝削，沒有階級，也沒有戰爭。人們只用獵具（弓、矢、與石器）與獸類作戰。到了原始共產制的末期，氏族社會裏，才有初期的「戰爭」，那只是爲了擴張不足的領土或抵抗異族的進攻。那時作戰的工具就是獵具，作戰的方法，是由個人的格鬪擴大到集團的暴力衝突。那時人們中間不存在奴役與剝削，戰勝者對戰敗者只邀請其參加戰勝者的氏族，當被拒絕時，也只把他們驅逐出去。氏族社會不知道壓迫人民的武裝組織，沒有軍隊，沒有憲兵、警察，沒有法官、監獄，也沒有貴族、皇帝。所以氏族社會

的戰爭，與階級社會的戰爭帶有原則上不同的性質。『只有跟着氏族社會的解體，才逐漸地改變了戰爭和武裝組織的性質。……於是戰爭的進行，已經是劫掠、壓迫與剝削了。』（列寧「論國家」）。

在奴隸制的社會裏，奴隸主私有生產工具和生產工作者——奴隸，剝削與壓迫奴隸。這時有了私有制，有了剝削，也有了階級。有了階級的壓迫，也有了階級的反抗，於是產生了爲掠奪奴隸、牲畜、財寶等的戰爭，也產生了奴隸反抗的戰爭。那時在生產力上有了金屬工具（銅的和銹鐵的），有了農業與手工業。於是作戰工具就不只使用獵具，而且也把生產工具（主要是農業的）與交通工具轉化爲作戰工具來利用了。在中國有所謂干、戈、艾等兵器，有了土圍（所謂『崇墉』），也有了『臨車』與『衝車』。不過戰爭的規模不大，堅韌性也很小，戰法也非常簡單。

在封建制的社會裏，是封建主與農奴、地主與農民的對立。反映着這種生產關係，及由這些階級矛盾發展而來的戰爭，有封建貴族地主階級與別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之間爲掠奪土地與農奴的不義戰；同時也有農民反抗的正義戰。

農民戰爭。封建社會初期的生產力發展之結果，就有了冶鐵業之改進，生產工具進步並增多了，作戰工具也隨之而改進與加多。在我國就有：弓、矢、干、戈、矛、戟、戈、彈、劍、匕首等兵器，和兜鍪、甲、冑等個人的防禦工具，更有較堅固的城寨。不過當時兵器方面還只有白刃，兵士則多是被迫來的農民或奴隸，因之隊形是密集的方陣（有分中左右三軍的，有六軍的，有如孔明之『八陣』的），工事は木柵的營壘，戰法也很簡單。然而因為有些地方因為不斷戰爭之故，也因為有世傳的封建將軍之故，戰爭的規律被發現了許多，所以戰略戰術的思想，相當發達，如在我國，就有孫子兵法（在距今二千四百年前）。這個時期繼續了相當長久的時間。

直到十四世紀，西歐人才從阿拉伯人手裏得到火藥，而把它運用到軍事上，於是火器出現了。當時的工業生產了火藥和火器，作戰方法發生了極大的變更。『引進火器——正如恩格斯所說——不但革命地影響了作戰，而且還影響於統治階級及被統治階級的政治關係。』那時城市市民（資產階級）有金錢有工業能夠製造火器槍和砲，『在一個時期，皇帝政權利用資產階級來和貴族關

爭，以使用一個等級，去抵制別一個等級」（恩格斯：「反杜林論」訂正本二一八頁）。那時候就依靠城市用大砲轟倒貴族堡壘的城牆，用槍彈打穿武士的盔甲，於是貴族統治也隨着崩潰了。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步兵與砲兵的作用也逐日增高，在砲兵逼迫下產生了工兵。但砲還是不能轉動的，槍還是從前面裝子、直靶、不能瞄準的火繩槍。到了十八世紀初，火繩槍才裝上刺刀，代替步兵裝備中的長矛。那時兵士是僱傭的和強迫編成的俘虜，軍官是代表封建勢力的利益，以鞭撻來統治軍隊。適應這種軍事技術與軍隊機構的戰鬥隊形是直線中空的方陣，利用這種火器與這一隊形作戰的戰術，就是「直線戰術」（或稱「橫隊戰術」），這一戰術，到腓得烈二世手上得到最高的完成。

資本主義從封建社會裏誕生，其初期資產階級以第三等級的資格與封建貴族及地主對立，發展為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及民族民主戰爭，但也參雜發生着侵略他國領土的戰爭。這時在生產力上出現了機器武裝的工廠及使用機器的農業。在這提高了的生產力之基礎上，作戰工具也進步了，產生了曲靶的能瞄準的從後面納子的來復槍，和高速度的砲車。不過作戰工具的改良，並不

馬上反映到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將軍們腦子裏。所以在美國獨立戰爭（一八七六——一八八三年）中，英國將軍們仍然用十八世紀的直線的方陣作戰，就被隱蔽在森林中的美國的流動散兵所擊敗。這種隱蔽的散兵戰術，與我國『蠻子戰術』差不多，可以看做一種游擊戰爭的戰法，它是由美國的獵人自然地發明出來，『這種新的作戰方式，是兵士成份改變的結果。』（恩格斯同書二二三頁）法國革命創造了散兵隊與縱隊配合的縱隊戰術。這一戰術由拿破崙所規定，它首先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兵士成份的改變，也因爲有了輕快的砲車與曲靶能瞄準的來復槍爲基礎。普魯士之採用後備軍制度，及使用新的後膛來復槍，成爲一八六六年戰勝奧國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生產的進步，武器的改良，到了普法戰爭（一八七〇——一八七一）時，雙方卻開始用後膛來復槍了，於是普軍於八月十八日聖拍利弗戰鬪中，由於依舊使用速的縱隊，以致五個團的兵力（一萬五千餘），只在兩小時內就死傷了三分之一（五千餘人）。軍隊被迫散開了，這種自行分散是兵士們的自發行動，不管指揮官如何認爲是破壞秩序而加以禁止，這種兵士的自發行動『勝利地支持了這一戰爭』，也從此產生了散兵戰

術。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最發展的國度裏，資產階級代替貴族而成了統治階級，資本主義也逐漸走上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這時帝國主義各列強之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以及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起來。而產生帝國主義時代的三類戰爭，（一）是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帝國主義戰爭，（二）無產階級革命或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之無產階級底革命戰爭，及（三）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這時，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生產力是高度發展了。隨着機器工業的進步，自動火器發達了，運動性加大了，這使得散兵線式戰術進而爲縱深戰術。又隨着航空工業與造船業之發展，民用飛機變成軍用飛機，由曳重機而發明坦克，由汽車而有裝甲汽車，由火車而有裝甲列車，由戰艦而生潛艇，由飛機而生炸彈……，所有這些，又使陸戰與海戰，由平面戰爭變成立體戰爭。這些都還是過去的事情。最近，爲對付水門汀的堅固工事，發明了特種炮與特種炮彈。機器工業與汽車工業之高度發展，推動了軍隊的機械化摩托化，鐵路公路的發達，容許廣大軍

隊的運動與集中，航空工業之發展，是鉅大空軍的基礎，電器工業之發達，又保障了廣泛無線電指揮的可能——所有這些生產方法上的進步，才產生了最近德國的閃擊戰。

由上述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看到作戰方法基本上是由生產方法決定的。因此戰爭基本上是依據於經濟基礎之上的。我們要研究任何時代的戰爭，都必須先研究該時代的經濟狀況。

由上述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到在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的進步的基礎上，才產生作戰工具的進步，而作戰工具又是由前兩者轉化而來。這種轉化，都是離開人們的意志而發生，開始時由於偶然的試用或臨時的應用，然後才逐漸轉到有意識的使用與改造。

社會生產力發展了，作戰工具也進步了，戰爭也發展了（更加以各國經濟的聯系，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可避免地要擴大與持久），但是戰爭不能毀滅全人類，相反地其發展的前途只有毀滅其自身。恩格斯早已說過：『這種軍國主義，本身包含着自已毀滅的萌芽。各個國家的相互競爭，一方面迫使它們每年化更

多的經費於陸軍、海軍、大炮等等上面，所以更加速財政的破產；他方面迫使它們不得不更加嚴重地採用全國徵兵制，因之結果，就教會全體人民去使用武器，並使人民得到一種可能，以便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指揮首長而實行自己的意志：當人民大眾（城市的工人與農民）具有一定意志之時，這樣的時機是要到來的。」（同書二二六頁）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更是這樣，我們試看最近各帝國主義國家裏政治之法西斯化，經濟之戰時化，已成普遍的現象，所以這種時機更快要到來。我們進行革命戰爭，正是促使敵寇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起來實行『自己的意志』。

× × × × ×

資產階級的軍事理論家，及其將軍們，不了解或不願了解軍事上的一切進步最基本的理由是生產的發展，他們總是把兵器之發達和戰術之進步，歸功於科學的進步；表面看起來，也有它近似的道理；但是他們的理論，為的是說明一切軍事上的進步，都應歸功於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其實連科學本身的進步，也還依靠於生產方法，首先是生產力之進步。這種最基本的進步，是勞動階級

的血汗造成的。唯心論的撒謊，決不能掩蓋鐵的事實。

日人吉永說：『作爲近代武力戰的擔當者的兵器，是存在於近代科學的基礎之上的事，是不待言的……兵器實在是代表當時科學發展的最高峯。……不論是一枝步槍一把大刀都是隨着科學的進步而進步而改善的。』(吉永義尊「近代戰爭與兵器」，原文見日本「改造雜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譯文見「新軍」第二卷第五期)雖然他也懂得「……平時的化學工業就可變爲戰時的國防化學，……機械化部隊之所以能奮其淫威，也不外是汽車工業政策的成功」，但他不願意把生產力進步爲軍事以至其他科學進步的根本推動力的本質與事實，指明出來。

白崇禧談到抗戰與軍訓時，也僅僅指出戰術隨科學進步而進步。他說：『作戰之要求又隨着科學而日益進步，無論古今中外可說都是一致的，至於戰術方面，則隨時代的進步而革新。科學既日益進步，而兵器的科學化影響於戰術的改變甚鉅。譬如：過去的橫隊戰術，變成縱隊戰術，密集戰術，變成疏開戰術，平面戰術，變成立體戰術，都因兵器革命裝備改良的關係……』(「抗

戰三年來之軍訓」，見「中蘇文化」抗戰三週年紀念特刊。

其實這僅能一般說明戰術的時代性一點，至於民族性革命性階級性等則都不能說明。在科學水準差不多的諸國家間，其戰術爲什麼也有不同呢？科學的進步又從何而來呢？我國科學又爲什麼不進步呢？爲什麼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又有不同的戰略戰術呢？這種問題之解答，需要看戰爭的性質，戰爭的政治目的，各該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狀況與自然條件等等具體條件，即敵對雙方有關戰力諸因素之對比，及敵方的戰略戰術而定。所以戰略戰術（作戰方法）改變的基礎，一般說來應向生產方法（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去找尋。否則卻不免同杜林等一樣，陷入唯心論的錯誤中。

但是在同一時代，同一民族，同一國度內，還會因戰爭性質的差異，及進行戰爭的軍隊機構與領導階級的不同，產生兩種極不相同的作戰方法，因而也生出兩種極不相同的戰略戰術的思想與理論，一種是舊的沒落的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戰法，另一種是新的新興的革命階級的戰法。這種新的革命的戰略戰術的可能，有兩個階段兩種形式：初期階段，是游擊戰；較高階段，是正規戰。列

寧在論「莫斯科起義的教訓」中提到這個名詞。他說：「……因為莫斯科已經着手提出「新式的巷戰戰術」這個戰術就是游擊戰的戰術。……」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在說到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時，也說到游擊戰爭的概念，他說：「……我們能夠運用過去……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相互配合的經驗，這種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

但是游擊戰爭不是獨立的戰爭形式，「它是戰爭中的一個形式與一個階段，而且從基本上說來是革命戰爭中的一個形式與一個階段」（「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當革命力量生長壯大到一定程度時，革命戰爭也隨之發展到新的階段。用新的形式即正規戰（以運動為主）的形式，配合以游擊戰，來同敵人作戰。但在有些革命戰爭中，正規戰與游擊戰同時存在，如現在的抗日戰爭。

這樣革命階級的作戰方法，不但依據於原有的社會生產力，同時更依據於新的革命的政治。唯心論者強調精神的作用，他們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忽視或害怕民衆力量，所以他們不能真正了解革命戰法的基礎。機械論者也不懂得這一點，『潛在武力』論者的錯誤，基本的從這裏發生，在思想方法上它是片面地了解經濟與戰爭的聯系，而忘記與抹殺其他重要的因素，特別是政治的因素。

當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在討論所謂「軍縮」的強盜會議中，對於『軍備』的定義，及隨之而生的『潛在武力』（或謂戰鬪潛伏力）的定義與界說，引起了許多爭論，以後於一九三一年由「國際議會聯盟」發表了一本由資產階級將軍、經濟學者、化學家、評論家們，集體寫作的「未來戰爭的性質」一書，裏面有三篇專門關於『潛在武力』的論文，作者爲法國經濟學教授威廉瓦爾特（Wilhelm Valtl）德國孟塞耳（Max de Montheilas）將軍及日本青野教授，此外還有其他同類的著作。在蘇聯沙維茲基的「戰爭經濟學」序文中，已給予了基本上正確的批評。沙氏說：『對戰爭之社會的性質之完全無理解，對各戰爭之個別的政治的之無視，問題之具體的歷史的剖解之缺乏，——這一

切，實際上不單只魯士比爾特個人的著作中的，而正是所有一切「潛在武力」論者的著作中的共同的特徵。」（「戰爭經濟學」一七一頁）

這些潛在武力論者，各各站在各該本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利益上，站在各該本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上，爭論什麼是戰爭現實的因素，什麼是潛伏的因素，什麼應該在裁減之列，什麼不應列入裁縮之內，這種羣盜之爭，我們且不去管他。單從他們的立論上說，他們都是不願在分別不同本質的戰爭的觀點上去看問題，他們不願或不敢看到過去蘇聯在反武裝干涉與國內戰爭中所表現的情況，他們根本不能分出那些被看作「戰鬥的潛伏力」的諸因素，以至現實的戰鬥力之在正義戰與不義戰中，其作用之大小，將有怎樣的的不同。他們不了解每種因素的變動，都將或多或少地影響其他因素，特別是人的因素變動時（如反戰）。瓦爾特不敢也不願提到正義戰中與不義戰中，政治因素對於經濟與軍事將起怎樣的影響，他把政治因素，看成不可逆料的東西，他說：「我們願意執着這一問題的技術與經濟的方面，而不欲涉及不可逆料的政治與精神的背景……」（見「將來戰爭的性質」一四二頁），他形而上學地測定時間空間的界

限，把各個國家單獨分開來「計算」其潛在的力量，他以為在應用時，可以「把任何一方面策動的潛勢力，相加起來，把它化成某一系數，並須計及不免有的缺陷，與使聯合反抗一公敵的數國的勢力相互調和的困難就得啦」。（同書一四三頁，注意點是作者加上的）。這種企圖以數學上的系數與方程式，來算戰爭的「八字」與命運，是瓦爾特教授論文的特點。在孟塞爾將軍，則以為「國家的戰鬥實力，第一決定於實際的因素，這些因素，可用數字確切表明（？），而且不管敵人是那一國，可以永無變動。」其實，資產階級的軍隊，對於進行正義戰的國家與對於同樣進行不義戰的國家作戰，「這些因素」作用的大小必極不相同。特別是如果進行正義戰的對方，能夠堅持持久的抗戰時，將更顯明。至於魯士比爾則把過去與未來戰爭勝負的關鍵，求之於交戰國雙方原料之多少，他以為奧俄之戰，俄國產銑鐵較多，故勝奧。南北美之戰，北美以富於石灰和金屬，故戰勝南美。第一次大戰中，德工業較強於俄，故勝俄，但「他較之英美仍有遜色，因之終致於敗；最後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是擁有最好的、最豐富的原料資源，和擁有戰爭機械生產最良的方法與手段的國

家，佔得勝利。」（轉錄自「戰爭經濟學」）這就更明白表示了魯氏之無視戰爭性質不同之影響，即無視政治因素之作用，自然魯氏不會也不願預想到在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中，將有若干國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會獲得勝利與解放（對於潛在武力論因沙維茲基已給予批評，所以這裏我不想多說）。

『潛在武力論』只是給帝國主義列強軍縮無結果，造成掩蓋的理論根據而已。

其實一切經濟條件及所謂『潛在武力』，都將受政治因素的極大影響，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將因其社會主義的政治因素，而把這些潛在武力以至現實武力，提高與發揮到最高度，反之各帝國主義國家，則將因其資本主義內部底許多矛盾與困難，不可避免地要使這些潛在武力，以至現實武力銷磨與損失。自然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將因他們中政治統治的能力與經濟組織的能力之差別，也會影響到這種『潛在武力』的作用之大小的。

此外，經濟條件與『潛在武力』就在進行正義戰的國家，如我們中國，雖然在某些因素上，是很優越的（地大物博人多……）但卻因國內政治機構與設

施的關係，縱使在抗戰三年中有某些進步，然而發揮這些潛藏的人力物力，一般說來，在大後方顯然是太不夠了。如果政治上不改良不進步，這些所謂『潛在的武力』，決不會轉變為現實的武力，因之戰略反攻，也難以坐待其到來。

在我國軍事界中，有些人也有這種與『潛在武力論』者差不多的觀點。楊杰將軍於抗戰前，在陸大月刊上發表了『對於中國戰術方針之蠡測』一文，認為決定戰術方針的條件有四：（一）國力（二）國民性（又分南人北人）（三）地形（四）假想的敵國，因此楊將軍的戰術方針是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支隊戰術』（即游擊戰），第二階段是『阻寒戰術』（實則『阻寒』僅為現代防禦警戒陣地前之一種設備，而算不得單獨的戰術——作者），第三階段是『後退防禦』（這裏不提及反攻，不知何意，——作者）。我們在這裏暫不批評這三階段戰術之正確與否（其實這種意見在抗戰發生後未起影響），僅據其四個條件來說，楊將軍也同那些潛在武力論者一樣無視政治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蔣百里先生則於抗戰後半年於柏林發表一文，題為『速決與持久』，認為『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又指出用『運動戰以達持久目的』，

『以攻爲守』，（均見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一八頁）。這些命題都是正確的，都值得贊揚的。不過蔣先生之所以主張運動戰，以速決手段達持久目的，爲的是看到我國『經濟力量』與『火力』之不足，（參看上述原文）而未看到政治的因素。因之這種觀點，與上述諸人的觀點基本上是一樣的。

在這一問題上，上述諸人的觀點，都不如我國最早的兵學家孫武。在孫武早於二千四百年前，一面看到軍事最基礎地依從於經濟，他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又說：『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又說『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其他因素，特別是政治因素。他說：『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又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見這裏孫子之所謂道即是政治，孫子對於決定戰爭的勝負條件看到經濟的、政治的、軍隊的以及自然地理等條件，這是全面的觀察法，所差的只有未分正義戰與不義戰的不同，未說到各個

條件之相互影響與可能的變化，及各國間的互相關係而已。這也是當時歷史條件限制的結果。

至於戰爭對於經濟的反影響問題，我們馬列主義者是給予辯證法的正確的回答，戰爭不只是引起破壞並且也會『把工業適合於軍事條件而造成生產之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集中，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列主義論戰爭與軍隊」之導言）同時『戰爭是聞所未聞的加速社會發展之巨大的歷史過程』（列寧）『他在促進並在尖銳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且導引到帝國主義環鏈上薄弱一環的破裂』（同上導言），戰爭除破壞一面外，還有另一方面，戰爭引起『資本主義底發展』，也就是戰爭對於經濟不但有破壞底作用，還有某種意義上建設底作用（這作用不但對於經濟也對於政治），尤其是正義戰中更顯明。毛澤東同志早於兩年半以前就指出：『戰爭底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一切東西。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與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與戰爭後得到改造。我們把抗戰與建國聯系起來看是

正確的。』(「論持久戰」二七頁)今天中國華北的抗日根據地上的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的建設，就是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所促成，蘇聯比捷洛夫也說：『所以戰爭對於中國的意義，不僅是破壞，而且是新的更高的基礎上的共和國的建設。』(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真理報)。

× × × × ×

這就是說，戰爭基本上是依附於經濟，但不僅僅經濟條件決定戰爭的勝負，政治及其他條件，也都能發生決定的或影響的作用，而戰爭對於經濟又能發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否認經濟為最基本的因素，是唯心論；只看經濟決定戰爭無視政治因素，或否認戰爭對經濟的反作用，則是機械論，我們都要反對它。

三 戰爭與政治的關係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要研究戰爭怎樣離不開政治，政治又怎樣貫徹於戰爭

全過程中，我們一方面是要反對輕視政治因素在戰爭中之作用的單純軍事觀點，另一方面也反對那種把政治與戰爭之目的與手段的關係顛倒的錯誤。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與瓦解敵軍等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與敵國人民的援助，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論持久戰」五六頁）『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東西。……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再現，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盡，戰爭仍須努力，以求貫徹。』（同上）

這就最明白不過地說明了政治因素在戰爭中之重要，說明了政治是目的，戰爭是手段。

有些人反對在抗戰中進步，他們要保守甚至倒退，他們口頭上雖也承認

『政治重於軍事』，但他們對於抗戰則在三條道路（投入英美集團，直接投降日本與繼續堅持抗戰）的交叉路口上徘徊，對於人民則採取高壓政策，藉口『軍政時期』不給抗日人民以民主自由，限制抗日軍隊之抗敵活動，對於政治工作則以特務工作代替，引起軍民不一致，官兵不一體，敵僞兇殘更張，對於統一戰線則製造磨擦，挑撥反共內戰，對於文化教育則採取統制與壓迫進步，對於外交則在三方面（德意日與英美兩大帝國主義間及以蘇聯為中心之國際和平陣線）之間動搖，……一句話，他們反對政治上的進步。

交戰國雙方的政治目的，都是隨着雙方所用的這種戰爭的手段的发展而運動。日本侵華戰爭，是其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其目的在於滅亡中國，進而吞併東亞，爭霸全球。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這個障礙，所以發動侵華戰爭，其目的早已確定於田中奏摺中。而這種目的的運動則由其手段——侵華戰爭——的發展中表現出來。有些『軍事家』不了解這一點，當他看到敵方『政略』隨其侵華戰爭的發展而運動時，就以爲是『……敵國政略又隨戰略而變移』，『其政略已步步隨我政略之後，而陷於

被動地位』。(徐培根：「抗戰一週年紀念日講演詞」)這就是不了解手段是由目的決定的，一個政治目的可用多種多樣的手段來達到，而各種各樣手段的採取，則皆根據於目的而來。克勞什維茲早於百年前指出政治的目的是左右戰爭的手段。他說：「戰爭不是別的而是政治關係用別種手段的繼續。我們說用別種手段者，祇是要同時特別指出，這種政治關係，戰爭本身是不能停止它的。不是改變為另一種絕對不同的東西；反之不論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是何種形式，在本質上還是繼續着，所以與這種手段而密結發展着的戰爭，直到最後媾和為止，都是按照着總的路線而追蹤着政治的」。(「戰爭論」)在這一點上說，戰爭中的各種手段只是現象的東西，而政治目的則屬於本質的東西。本質的發展由現象表現出來，但種種現象都是本質的。因為作為本質看的事物本身，就有其矛盾的正反兩方面。從其正的一方面表現出來的是與本質相適應的現象(雖然是片斷的不完全的)，從其反的一方面表現出來的是與本質似乎不相應的假象(也是片斷的不完全的)，然而假象仍是本質的，是本質反的一面之表現。例如日寇最近從正面上撤兵，並擬更大的撤兵，這在表面上看，

似是「不進攻」中國，如果一看其帝國主義的政治目的的本質，就知道這也是一種手段、一種假象，對中國是政治誘降，對世界是佈置與乘機南進。

本質的發展與運動，是由現象表現出來的。作為本質看的日寇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的國際形勢下，在一定的戰爭情況下發展着，由滅亡中國到獨霸東亞的目的與本質，是由進攻中國到南進的手段與現象表現出來。這就是說，日寇之南進並不是也不會放棄其滅亡中國之目的，我們不可被一時的現象所迷惑。

這就是說現代的民族戰爭，不能離開民主革命，否則不能勝利。這就是說堅持抗戰必須與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聯系起來。在這一點上說，「政治重於軍事」是正確的。

四 戰爭發展的規律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要說明戰爭規律是什麼，我們一方面反對否認戰爭規律認識之可能性的不可知論；另一方面也反對不了解戰爭規律的發展的機械

論。

戰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的現象，它隨階級的發生而發生，隨階級的發展而發展，也將隨階級的消滅而消滅。

如果說社會現象的聯系及相互依存，是社會發展的規律，那麼軍事與政治、經濟、自然、地理等聯系與相互依存，就是戰爭發展的規律了。如果說社會生活、社會發展是可以認識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可靠的有客觀真理的意義的，關於這種發展的研究是科學的話，那末，戰爭發展的規律也是可以認識的，關於戰爭發展規律的智識也是可靠的，有客觀真理的，關於這種發展的研究也是科學的了。

這樣戰爭的前途是可以預測的；而這種預測只要它是根據客觀的戰爭發展的規律，就可成爲科學的預見。四年前共產黨就預言了的抗日戰爭的長期性（見毛澤東同志與斯諾的談話），比起那些以爲「只要打三個月，國際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以解決」的唯心的武斷推測，誠有天淵之別。

實戰證明了戰爭規律認識之可能，如果可以調動敵人於運動中而消滅之，

那末敵人行動的規律之認識是被證爲可能的了。如果在夜間襲擊敵人比在白天攻擊敵人更易奏效的話，那末在一定條件下，我軍人力能夠發揚，敵人火力不能發揚的規律，也可以把握了。

這樣，依據與把握戰爭發展規律，定出指導戰爭使向勝利方向發展的法則，就成了正確的戰略，而研究戰爭發展的規律與依此規律指導戰爭的法則，就成了科學的戰略學。

否認戰爭規律認識之可能，就會根本否認戰略與戰術，而把戰爭勝負之數委之於天數或不可知之列。失了勝利的信心，也會放鬆對戰爭指導與進行應有的努力。楚項羽之『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是否認主觀指導上的錯誤。諸葛亮之『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者也』，則是企圖以主觀指導的能力，改變已知不易挽回的局勢。至於所謂『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封緣數奇』，那只是詩人不平的說法。

如果承認戰爭規律，而把它看成死的不變的，也不對。社會是發展的，階級鬥爭也是發展的，戰爭也隨着發展；因此戰爭規律也是發展的。把古代兵法

呆板的應用於現今的戰爭，那只是所謂『徒讀父書』的敗將。抗戰初抄襲曾國藩的兵法，結果招來淞滬的失敗。

因此，我們必須從客觀的敵我雙方各種條件之對比上，從我方軍事與政治、經濟、自然、地理等的聯系與相互依存上，從戰事現象之聯系與發展中，去觀察戰爭發展的規律，觀察此規律之發展及其方向，並把握此發展規律，以指導與進行戰爭到最後的勝利。

（載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號出版之八路軍軍政雜誌三卷一期）

第二部份 關於戰法的唯物辯證法

五 戰略戰術之差別性與同一性

這裏要講戰略戰術之時代性，民族性及進步性或保守性等之差別性，及各種戰略戰術最一般的原則之同一性。一方面，反對只看重此種同一性，而忽略差別性的軍事上的條文主義、公式主義；另一方面，也反對只看重差別性，而反對同一性的狹隘經驗論。

戰爭雖然有它一定的發展規律，但各種性質、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戰爭，卻因其性質、時代與民族之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規律，這是戰爭規律的差別性。另一方面，各種不同性質、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戰爭，又因它們都還是戰爭，因而也都還保持有一般戰爭的規律，這是戰爭規律的同一性。

基於歷史上各個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不同，所以各時代的戰爭發展規律也不同，隨之而生的是各時代的軍事思想戰略戰術也有不同。各民族有各

民族的特點，因之，在同一時代中，各民族的戰爭將因其民族之特點而生戰爭發展規律的不同，隨之而生的是各民族的軍事思想戰略戰術也有不同。同一時代、同一民族又將因戰爭性質之正義與不義（革命戰爭或反革命戰爭）而使戰爭發展規律有性質的差別，隨之而生的是正義戰的新的軍事思想、新的戰略戰術（這是由當代的進步階級所提出），與不義的舊的軍事思想、舊的戰略戰術也有性質上的不同。這就是戰爭規律與軍事思想戰略戰術差別性的根據。

但各時代、各民族、各種性質戰爭中的戰略戰術思想與軍事理論，除了上述的這些基本條件決定外，還要受當時當地的哲學思想與前代的戰略戰術之傳統思想與軍事理論所影響。這就是說，任何一種戰略戰術思想與軍事理論（1）都受當時當地的物質生活條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決定；（2）都受戰爭之正義性與不義性所決定；（3）都受當代以至前代哲學思想所影響；（4）都受前代以及當代戰略戰術思想與軍事理論所影響。

我們抗戰是民族革命戰爭，與一般戰爭不同，因此於一般戰爭規律之外，還應看到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我們抗戰又是中國民族進行的正義戰，與外國

的革命戰爭不同，因此於革命戰爭規律之外，還應看到中國民族戰爭的特殊規律；我們的抗戰又是現在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過去北伐時代及蘇維埃時代中國對內的革命戰爭不同，因此於中國民族革命戰爭規律之外，還要看到現代的特殊情形與特殊規律。這就是說當我們接受各種戰爭經驗時，都必須顧到中國民族的、現代的革命戰爭的特點，而具體運用前人或令人血換來的經驗與教訓。（所以我們現階段的運動戰不是歐洲式的運動戰，就是說我們的運動戰是不包含陣地進攻的運動戰。因之，舊戰術的原則有許多不適用，我們要調動敵人到運動中打擊之，不是把敵人從陣地內趕出來打擊之。我們的殲滅戰也與外國的不同，不是「卡內」「色當」與「擔能堡」的集中殲滅，而是分散的殲滅。諸如此類。——自然只是在目前條件下如此，今後在戰略反攻中將有所不同。）

否認戰爭規律的差別性，不分皂白，抄襲外國操典，或不了解戰爭規律之發展而搬弄古代兵法，結果都只有失敗。否認戰爭發展規律之同一性，忽視前人血的經驗，自恃自己聰明，或固執局部的片斷的規律，誇大自己經驗的意義

與作用，不求研究與進步，也都要在變化複雜的戰爭面前碰到釘子。

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因戰爭性質之不同，將有不同的規律，因指導戰爭階級的不同，將有不同的思想。蘇聯十月革命後反武裝干涉及國內戰爭中紅軍與白軍所進行的戰爭，有了性質上的根本不同，所以雙方雖在同一時代、同一國度裏，而一切戰略思想、軍事行動等等也都有重大的差別。中國抗戰雖是在同一時代、同一民族、同一性質的戰爭中，但由於各個軍隊的機構與領導的不同，以致抗戰的戰略戰術思想與戰略戰術行動，在過去與現在也都還有重大的差別。抗戰是全中國廣大人民進行的，但抗戰的戰略卻有兩種，一種是代表最少數的沒落階級的利益與思想，不適合於戰爭、不適合人民利益與軍隊利益的；爲這種思想所支配的軍隊，對敵軍則消極應付與敷衍，對真正抗戰的友軍，卻積極地陰謀與暗算。另一種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與思想，適合於抗戰適合於人民利益，也適合於抗日軍隊利益的；爲這種思想所領導的軍隊，對敵軍是積極打擊，對叛軍是堅決討伐，對友軍則仁至義盡地力爭團結互助抗戰。要把後者克服前者，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鬭爭。在將來軍隊隨政治進步而進步

時，這一鬪爭就會逐漸得到勝利。

總之，我們應看重戰爭規律的同一性，也應看重其差別性。只有這樣全面的看法，才能正確地批判與接受每個過去的與外國的外處的戰爭經驗；把那些經驗中與我們目前進行的戰爭共同的用來做我們行動的借鑑，把那些不同的，根據我們的特殊情形而給予變通。這是我們研究與學習的方法。

六 戰略之全局性與戰術之局部性的關係

這裏要說的是：戰術服從於戰略，所以戰術指揮員應了解一定程度的戰略問題，並服從命令聽指揮，而全局為局部所構成，所以戰略指導者也不可忽視局部的因素；並給予適當的軍事民主。

世界戰爭、世界是一全局，國與國戰爭、一國是一全局，敵後游擊戰爭、敵後是一全局，一個戰略區內的游擊戰爭、戰略區也是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與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毛澤東同志「戰略問題」），反之，凡屬全局中之一方面一階段的戰鬪或戰役，則都是全局中的局部。

指導戰爭全局的爲戰略，指導作爲戰爭之局部的戰役的爲戰法，指導戰役中各個戰鬪的爲戰術。

凡是建軍與訓練，根據地之創立與鞏固，各種政策與軍事之配合，各個戰役之方針與相互關係，各個作戰階段間之關係，我方全部活動與敵方全部活動間之關係，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勢間之關係，……等等的關係，都屬於戰略範圍，（就是說也都是戰略指導者應注意的工作）都是全局性的東西。

至於戰鬪動作——進攻、防禦、追擊、退卻，戰鬪勤務——偵察、警戒、防空、防毒、防坦克以至行軍、宿營等等，那都屬於戰鬪的範圍，都是局部性的東西。

一時之勝敗，一地之得失，都應從這種關係上去看它。

至於說：「一子錯滿盤輸」，那是帶說有全局性的有決定意義的「一着」，關係全局勝敗的局部，而不是帶局部性的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東西。所謂「百戰百勝，一敗塗地」，那「百戰」是不帶決定意義的部份的東西，那「一敗」是帶決定意義的全局的東西——也可說是鎖鍊中主要的一環。指導全局者最應注意於最吃力的就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也就以此爲最重

要的時機。

所以局部的勝利，有時對全局反爲有害，部份的失敗有時卻挽救了全局。這就是說：爲了顧及全局，有時「見利不趨」，爲了顧及全局，有時「犧牲不辭」。所以各級指揮員，都應了解戰鬪戰役以至戰局的全般情況，最低限度也應了解直接上級的任務與企圖，否則一切「機斷專行」都失了根據，都會弄成錯誤。另一方面，全局爲局部所構成，因此不可忽視局部的因素與勝敗，特別是有決定意義的帶全局性的局部問題。

七 戰略戰術之鬪爭形式與軍隊之物質內容的關係

這裏要講的是軍隊之質量決定戰法之高低，要提倡革命戰法，就必須改進黨革命軍隊。

今天我們進行的是新的革命的戰爭，自然應該使用新的革命的戰略戰術。「從前那種作戰的舊腦筋，必須要完全改變過來，而要真正能夠連屢革命戰爭的新戰術新方法。」

然而爲什麼言者諄諄，唇焦舌敝，會議開了許多次，小冊子也印發了萬千，命令下了若干道，紀律約束了許多條，而其結果，仍然見到不斷的「將士傷亡，挫頓而退」呢？爲什麼「計劃週到」，「準備完全」，「部署適當」及「運用靈活」，還不足以取得勝利呢？原因很簡單，任何運動形態，任何鬥爭形式，都由物質的內容來決定；空洞的方法方式，沒有一定的內容，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新的革命的戰略戰術，必須有新的革命的軍隊出來表演，而且一般說來革命的戰略戰術，都是革命軍隊在鬥爭中創造與逐漸完成其體系的。很明顯的，如果沒有進步的抗日軍，就不會有今天我們抗戰中新的戰略戰術。那些只在口頭上高談「革命戰術」、「革命戰法」或「新戰術」的軍隊，其所以不能戰勝敵軍，甚而採取避戰的方針，不敢與敵週旋，就是因爲它們軍隊機構沒有改變，所以想學學不好，想做也做不到。如果要進行「反共」戰爭，那是貨真價實的十足的反革命戰爭，自然更談不上什麼「革命戰術」，也不必談了。不過在另一方面戰法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影響軍隊，如果我們抗戰將領都能領導軍隊堅決繼續抗戰而不是反共，並能夠真正的研究與應用革命戰法，那也可

以逐漸影響到軍隊的改造，所以堅持抗戰、反對反共，力求進步，是我國民族目前最主要的任務。也是全國抗日軍隊底最主要的任務。

什麼是革命戰術呢？有人（指蔣介石，當時因團結抗戰故不便指名批評——作者補註）以為它的特點就是「靈活」，善於打擊敵軍。其實一切較新的戰術都有這個特點，還算不上革命戰術，所謂「革命戰術」、「革命戰法」，實際上就是革命軍隊的戰略戰術，革命軍隊的戰法，它與一般戰略戰術或戰法的不同點，就在於：（1）它是服從於革命的政治，為革命戰爭而服務，為大多數人民利益而服務；（2）它依靠廣大羣衆的力量，首先是革命戰士的力量，及戰地民衆的力量，它以軍隊團結，官兵一體為基礎，以軍民一致能得民衆幫助為基礎。它不專靠武力消滅敵人的身體，而能以其進步的主張爭取敵軍士兵之同情（而不是利誘或欺騙）與瓦解敵軍，減少自己作戰的困難；（3）它能正確地反映戰爭的發展規律，所以較能取得勝利。

現在讓我們從幾個具體問題上來說明：

第一、在政治工作（軍隊的政治保障）上。有人以為推動政治工作只是政

工人員「以民衆教師爲己任」，「對於當地民衆予以組織訓練」，「以溝通民間感情，取得民衆的助力」就行了。其實，只以「政工人員」擔任民衆工作，這已嫌不足；而不發動民衆，就無從組織民衆，不給民衆以抗日的自由，不改善民生，民衆就發動不起來，也無法「取得民衆的助力」。所以革命軍隊要與民衆連系在一塊，「成爲民衆的武力」，就必須從上至下都懂得並真正爲民衆利益而戰爭，民衆工作必須發動全體指戰員（官兵）都參加，軍隊對民衆的紀律，必須全體指戰員一致遵行。革命軍隊不是「不干涉政治」，而是幫助當地政府去發動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發揚民衆之民主精神，幫助民衆改善生活，領導民衆與敵人鬪爭。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民衆的助力」。

第二、在偵察警戒（軍隊的戰鬪保障）上。有人以爲只要訓練好偵察與使衣隊，就可以察明敵情，只要幹部訓練得好，有戰術素養和實際精神，就可以使警戒嚴密。其實，革命戰爭，尤其我們中國今天抗日的革命戰爭，如果不依靠民衆幫助，不依靠敵據點內敵僞軍中進步的同情份子之幫助，而只靠軍隊自己偵察警戒，只靠自己有限的間諜機關（而且還不可靠的），則敵情決難及時

明瞭（山東曾有一個師長在脫離其本軍的掌握而被敵掃蕩時，要求隨當地八路軍一個連長行動，說：「你們的情報好，我們則如同瞎子」），警戒也決難做到嚴密。就是軍隊本身的偵察警戒，也須要戰士的自覺、奮勇耐勞，指揮員的認真負責（自然也要有戰術素養），以及政治工作人員之幫助（政工的保障），這些都非改善軍隊的機構與軍事制度不可。只有在「官兵一體」的革命軍隊中，才能求得指戰員之奮勇耐勞，而在保持軍閥制度的軍隊中，是不能多見的。

第三、在供給衛生（軍隊的物質保障）上。有些人以為只要成立了軍醫處、軍需處、兵站及野戰醫院、兵站醫院等，則軍隊的供給衛生工作就算完事，結果到了冬天（如去年十二月）有些軍隊還沒有棉衣穿，有些軍隊只吃兩餐稀飯，以致有些士兵看到居民吃飯流下眼淚來。傷兵的救護運送與醫藥則更成問題，抗戰初在晉北有過以汽車搬運大官們的傢私不運傷兵的事，最近在西南也有以汽車從淪運金出國，而傷兵得不到及時運送的事（南寧失守前，也有過援軍得不到汽車載運的事），野戰醫院的工作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然也有進步的，也有好的，但壞的數目相當多，而像「蛻變」劇中所描寫的好人的「監理員」卻

很少，（實際上沒有）但是在華北中敵後極困難的環境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生活雖極艱苦，但卻能及時易衣，及時得食，傷兵得到民衆的救護與幫助，治療的醫術也有極大的進步。這沒有別的辦法，主要是依靠民衆而得到民衆的幫助（包括醫生的幫助），所以革命軍隊的軍事行動，時常都注意到居民的政治條件問題，這也是與一般戰術不同的。

第四、在戰略戰術上。有人以爲只要有特殊的技術，能跋山涉水，便可以「出奇制勝」；其實「出奇制勝」，或是用新發明的兵器（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之用毒瓦斯與英法之用坦克），或是新軍隊採用新戰法（如八路軍之在華北，實行山地游擊戰。）沒有新的軍隊與新的兵器，「出奇制勝」就很難成功。一般的戰士，只能訓練出一般的技術，特別在抗戰中，我軍訓練時間之短促，更難求其有如何超羣出衆的特殊技術，過去所謂「飛簷走壁」的神技，現在已很難見到。至於破壞交通，革命軍固然應儘量提高爆破技術，但還依靠廣大羣衆的幫助，「改造地形」也是一樣。華北的破路戰中，曾動員整千整萬的羣衆參加，甚至還有婦女參加，並有軍隊的有力配合，然後才收到效果，那裏

的缺點，就是爆破器材的缺乏，可是從來就沒有人發給過。

總之，有些人之所謂「革命戰術」，都由於主觀的片面的觀察問題，只看到一些鬪爭的方法方式，而忽視其餘很重要的鬪爭方法與方式。其實革命戰術，如果離開了民衆的幫助，離開了民衆武裝的配合，離開了自己軍隊內人力的發揚，就沒有真實的內容了。革命戰爭，雖是武裝鬪爭這一最高的鬪爭形式爲主，但還必須要有其他鬪爭形式的配合，而武裝鬪爭中，也還需要低級的形式與高級的形式之配合（如游擊戰與運動戰之配合）。很顯明的，沒有政治鬪爭，不能打破敵人的政治誘降，沒有經濟鬪爭，不能打破敵人經濟的掠奪封鎖與破壞，沒有文化鬪爭，不能打破敵人在文化上的欺騙與麻醉；而正規戰必須有游擊戰的配合，敵後游擊戰中，正規兵團還要游擊部隊以至游擊小組的配合。各種鬪爭形式，圍繞着主要的鬪爭形式，相互配合，才能取得勝利，而單純的軍事抗戰，決不是「革命戰術」。

另外有人（指閻錫山，當時因團結抗戰關係，未指出他的姓名——作者補註）說革命的戰法，「戰略上不是打敵人的武力，而是打敵人用武力的目的，

戰術上不是要死守據點，而是要打死敵人」。戰略上既不敵之武力，而在戰術上又要打死敵人，豈不是戰術不服從於戰略麼？不打敵人的武力，而能打倒敵人用武力的目的，這真是唯心論的詭辯。在這種情形下，這一「革命戰法」最近發展爲：「以堡壘式的防禦，對波浪式的進攻」，於是聽說有人發問，這豈不違反「革命戰法」的精神麼？（據說革命戰法就是游擊戰與運動戰的配合）答覆說：「這是對付×路軍的」，於是「革命戰法」也就壽終正寢了。

還有人說：『我們抗戰中戰術思想，應當建築在那一方面呢？我以為應當建立在精神方面……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獨立自主的戰術思想，必首先振作我們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說要把這種戰術思想在心理上建立起來，在心理上充滿了新戰術思想，才能夠運用新戰術，才能收到戰術的效果』（陸大參謀月刊創刊特大號金典戎「抗戰中應如何建立中國獨立自主的戰術思想」）。好了，心理上的新戰術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到金先生心裏去打仗吧！可惜敵人卻在戰場上。

爲要打退戰場上的敵人，我們還是要有新的國防軍，新的武力。孫中山先

生說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蓋舊時代之武力，為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家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北上宣言）所以我們需要能運用新戰法的革命軍隊，據孫中山先生說：這種「革命軍的責任，是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夠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革命軍是為三民主義去奮鬥的，為三民主義去犧牲的」（革命軍之責任），中山先生又說：「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三民主義是打破舊思想的主義）「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為公者與為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者龜？」（軍人精神教育）這與史太林所說：「知道為什麼打仗的軍隊，就是百戰百勝的」，有相似的地方。

這種能運用革命戰術的革命軍隊，在革命戰爭中，是百戰百勝的軍隊，今天已經有了活的模樣擺在抗日戰場上，用不着在這裏介紹，只要大家肯去學，學得多少，就能打多少的勝仗哩。

八 戰鬪力中的多樣矛盾及其利用

這裏要講戰鬪力的構成，其內在的諸種矛盾及此等矛盾之利用。我們的戰術就是從此產生的。

戰鬪力直接構成的因素，是物力與人力的有機結合。

物力——兵器——戰鬪手段，其量與質，基本上直接決定於軍事工業的生產力，與一般的生產力（自然這種生產力是與一定的生產關係有密切連系的）。由於現代生產力之發達，才發生現代兵器與戰鬪的特徵，例如火器之自動裝置的加多，摩托機械化部隊與兵團、廣大的空軍、軍用化學品、電氣的通訊與偵察器材……等等的使用。關於這一方面的詳細分析，我們在上面「戰爭與經濟的關聯」中，已經大體講過，這裏不再詳細分析它。

人力——兵員——戰鬪中的勞動力，其量與質，基本上決定於生產關係，即決定於政治條件。

先說人力的量的決定。人力的量，不但決定於一國人口之多少，而且還決

定於生產率與死亡率之多少，國民健康的程度，社會生產力之高低。（工業發達的國家，其動員人數可達一五——二〇%，因戰爭性質的關係之影響，留在下面講）由於作戰方法之影響，非武裝的勞動者與武裝戰士之比例，及前方與後方人數比例之變更（現代歐洲式的軍隊，加大了非武裝勞動者及後方人員之比率），由於戰爭性質，政治動員（或徵募或強拉……）之差別，所引起的投軍之踴躍與否，等等；此外裝備之足否，糧秣之豐富，幹部之多少等，亦可使兵員數量隨之而增減。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關係條件，多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也可說是屬於生產關係的。

再說到人力質的方面。人力的質，包含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治政因素，一是肉體因素。政治因素關係於：（1）戰爭性質（戰爭目的與勞動人民利益之向背）及戰鬪員對此性質之了解與否；（2）軍隊之機構，官兵之關係，軍隊之政治生活等；這是決定戰鬪員願不願使用武器作戰的問題。至於肉體因素：（1）勞動的體力；（2）學習軍事技術以至政治問題的領悟能力；（3）文化水準；以及（4）運動技術（如爬山、泳水、滑雪、騎馬、超越障礙等）等等；這是決定

戰鬥員之善否使用武器作戰的問題。由此可見人力量與質之提高，都要靠政治之改善。

一般說來，敵軍的物力方面，比我國強。人力方面，則論訓練，敵較我強（肉體因素），論對戰爭的態度，我國本應強於敵軍，但是許多軍隊卻因軍閥制度之依舊存在，徵募時之強迫，軍隊中政治工作之缺乏，反較敵軍有法西教育者不如。因此一般說來，我國一般的軍隊僅有人力量的優勢一點。而這一優勢，僅僅是由於我國人口絕對數之多（即四萬萬五千萬。若與敵國人口比較，則為相對的多），而因政治的不進步，經濟的落後，至今正規軍還不到全國人口百分之一。這種數量，對在華敵軍總數說，不及二倍（而目前政治條件下，戰爭需要我國多於敵寇五六倍的兵力）對於我國廣大領土之分佈上說，亦嫌不敷分配，因此相對的說，我軍數量還不夠多。我們需要更多的抗日正規軍與更多的抗日游擊隊。而在質的方面，我們也應提高一步，無論在政治素質上（地方的政治動員與軍隊的政治工作），無論在肉體因素上（如技術與文化水準之提高。南寧戰役後還有人提出士兵的識字問題，那已是抗戰開始後兩年了）。

只有提高我們抗日武裝的質與量，才能轉變敵我力量之對比，而達到反攻。

此外，在上述物力人力兩個客觀的基本條件外，主觀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亦為戰力高低的因素之一，它將在一定條件下影響戰鬪力。

至於戰鬪力之一般評價，不可僅僅限於上述構成戰鬪力的基本因素本身之上，戰爭性質，作戰地區，作戰時間等條件，都會給戰鬪力在其作用表現時，以若干影響。在正義戰中與不正義戰中，將發生很大的作用，（有些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在反共戰爭中，總覺得其失敗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一種地區上作戰，裝備強的軍隊，可能比裝備弱的表演得較差，在一種季候一定地形上作戰，戰鬪力強的軍隊，有時也不能十分施展其能力。因此，要求我們依具體的情況，及其必然的發展規律，來估計戰鬪力之高低。

根據上面的分析，雖然敵軍在若干方面較強於我軍，但是敵軍戰鬪力中仍然不可避免的保有多樣的矛盾，這些矛盾給予我們利用之可能，我們的戰術，就應該也曾是從發現與研究這些矛盾及其利用法中發展起來。

戰鬪力中的矛盾可分為：（1）物與物間的矛盾；（2）物自身的矛盾；（3）

物與人的矛盾；(4)人與人的矛盾；(5)人自身的矛盾。

現在分別記述如下：

(1)物與物間的矛盾——大砲需要砲彈，坦克、飛機需要汽油，工兵需要工兵的器材（架橋、爆破、土工、鐵路等器材），砲兵需要砲兵的器材（觀察器材、駄具、彈藥……等）。軍隊愈是現代化，彈藥、燃料、器材、糧秣、被服等等之仰給於後方就愈多。這就規定了日寇從開戰到現在，都不能不沿交通要道（大江、鐵路）爲主要的進兵方向，鋪設公路爲後方聯絡。因此日寇對於我們敵後的游擊戰，特別是交通戰，最感到頭痛。過去往往一次鐵路被破壞之後，敵方即發生幾個自殺的士兵，其原因在他們的絕命書上說是「歸路已斷，無望生還」。我們利用這一矛盾，展開大規模的交通戰，特別是最近的百團大戰，把四面的敵人交通截斷，於是天險的娘子關被我克服了，井陘的煤礦被我破壞了，正太路被我毀平，沿路敵軍被我全部消滅，晉察冀邊區克復了四五十處大據點，敵軍大部被殲，晉東南則克復過榆社縣城，守敵亦全部被消滅。利用敵人這種矛盾，於我們還沒有「三十個師」卻打下不只「一個據點」。（當

時蔣介石罵他的部下「三十個師打不下一個據點。」

這一矛盾在全局上說，則表現在敵人的大軍久戰與其戰費之支拙，原料資材等之消耗等矛盾，形成了財政經濟上的困難。

(2)物自身的矛盾——一切兵器同其它事物一樣，本身都有各種各樣的矛盾，也正因為這種矛盾的不斷發現與克服，才使兵器獲得改進。但改進了的兵器，又發生新的矛盾，這種矛盾絕對無法消滅，這就是所謂矛盾的絕對性。這種矛盾的消滅，只有等到兵器本身消滅之時，才能一起埋葬。舉例來說：坦克的裝甲，因反坦克砲的發明與使用，而逐漸加厚，機關槍打不進一般的坦克（除了用穿甲彈），反坦克砲也打不穿重坦克的鐵甲，可是山砲、野砲之被用來防坦克，鐵甲又嫌薄了，如果鐵甲加厚，則會引起坦克的速度減低，於是重坦克仍不能全部代替輕坦克，任何坦克以至任何兵器（自然在新發明時可以橫行一時），也都不能無敵於戰場。再說坦克的展望孔，大了，易為敵方瞄準射擊，小了，又使觀察困難，射擊之死角擴大，對走近身邊的敵人，不便射擊。坦克有了無限軌道（履帶），白天在一定地形上，可以橫行無忌，但既不能爬

高山，又不善過水田；夜間更無法活動。因此它怕集中的手榴彈，又怕手榴彈和汽油瓶（西班牙戰爭中，政府軍即以此對付德意及弗郎哥的坦克），它不敢上山作戰，也不敢深夜出門。

再說大砲吧。山砲比野砲輕，野砲比野戰重砲輕……，愈重則威力愈大，但運動卻愈困難。愈輕雖運動愈便，但精度卻愈差，效力亦愈小。砲兵在陣地上威風十足，但如在運動中遇敵時，又要「下架」、「放列」、「用炮」，需時不短，倘使猝遇敵人，措手不及，既拿不起，又拖不動，還不如木棒一條。並且一到夜間，則瞄準不易，運動亦困難。因此，它怕在運動中遇伏兵（特別在山地），怕在夜間被襲擊。

飛機飛得快，則載重不多，載重多，則飛行不快。又載得多又飛得快，則價值太昂，製造不易。載彈量既然有限，在飛行中命中精度又差，於是除對死不動的陣地，可以大肆轟炸外，對流動分散的部隊，就多無可奈何。夜間雖也能用照明彈補助觀察，可是除對城市外，在大山叢林、廣漠的原野底上空、也

照明不勝照，摸索無可摸。並且飛機不能整天整夜飛在天上，當它休息在機場時，它還要人來保護它，警戒一不嚴密，一根火柴，就可把它焚燬，於是夜間就成了敵機既不使進攻，又吃力防禦的時候了。

坦克、大炮、飛機這三種兵器，是敵軍比我軍強的主要東西，然而它們本身都有缺陷，正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於是也都有辦法對付它們。對付的辦法，在作戰的方式上，多採取運動戰，游擊戰；在作戰的時間上，多選在夜間（或濃霧之下）；在作戰的場所上，多選在山地及其它有利的地形。這就是我們對敵軍武器自身的矛盾的利用。

(3)物與人的矛盾——物與人的矛盾，第一是人會不會或善不善使用物，第二是人願不願使用物。前者屬於軍隊訓練，後者屬於政治情緒。敵軍訓練誠然比我軍稍優，但因為敵人進行的是不義戰，所以敵軍士兵作戰的情緒不能提得很高，也就是說敵軍的物力雖優，人的訓練雖好，但人不大願使用物，這是敵軍的主要弱點之一。縱使敵方有法西的欺騙教育與武斷宣傳，但其士兵大眾終會覺悟，等到敵軍士兵的覺悟逐漸普遍的時候，那些頂會使用武器的敵兵，

都將不願使用他們自己的武器替他們自己的敵人，打他們自己的弟兄。就在今天看來，敵軍的人力顯然比其物力弱，在火力戰中，我不如敵，在白刃戰中，敵不如我。這種矛盾，過去到今天都存在過，並且在發展着（敵軍厭戰情緒之擴大，反戰宣傳品之增多，繳械也比從前容易了許多）。我們利用這矛盾，一則加緊對敵軍之瓦解工作，一則避免敵之火力機械與技術的長處，向其人力的弱處進攻。

（4）人與人的矛盾——這在敵軍中，主要表現於官兵之間。在敵國內的則表現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基本的矛盾——戰爭的需要與利益屬於財閥、軍閥，戰爭的犧牲與負擔落在勞苦大眾肩上——所引起更強烈的敵國內的階級矛盾與鬭爭。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必將戰潰的主要根源，這是我們進行瓦解敵軍工作的客觀條件。我們對敵軍的宣傳，戰場紀律之整飭，俘虜之優待，敵傷兵之醫治等，都是用來擴大敵軍這一矛盾，使之崩潰的。此外敵軍與偽軍的矛盾，也是我們所應利用的。我們有些部隊利用了這種矛盾，可以採得消息，可以爭取偽軍，可以掩蔽交通，可以便利的打擊敵人。這裏要求我們加強瓦解與

爭取敵僞軍的工作。

(5) 人自身的矛盾——在敵人方面，敵兵一面拚命作戰，一方面則想念家鄉，我們初看到敵兵的不肯繳槍，頑強作戰，以為是「不怕死」；其實，敵兵之不肯繳槍，有種種原因，除了敵寇法西斯的宣傳教育，武士道的傳統，迷於初期勝利的信心……之外，有民族的隔閡，害怕我軍殺害的心理，所以不繳槍，正是一種怕死的表現（其實他們在不義戰爭中，怕死是應該的）。近來華北我軍火線上對敵軍的喊話，特別在要繳槍時，很收效果，整班整排的敵軍，自願繳械投誠。這就是說敵兵一面又不能不打仗，一面又怕打仗，想及早回家，這種矛盾，也是我們所應利用的。我們對敵僞的宣傳，都應考慮到這點。

總之敵人的種種矛盾，都是圍繞於其基本矛盾——敵國統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而運動的。這些矛盾在其戰鬥力中所表現出的，可利用作我們戰術的依據（敵軍戰術以至戰略的一切變化，都由這些矛盾而來），在其戰爭諸因素中表現的，則可為我戰略的依據，我們應善於利用敵之矛盾戰勝敵人。

至於我方，自然也有這些矛盾的（雖然大小不同，性質亦有些差異）。那

就要求我們善於縮小這些矛盾，在適當條件下統一調和這些矛盾，而不予敵以可乘之隙。例如爲了消滅物與物及物自身的矛盾，我們應該加緊軍事工業及一般工業的建設，爲了消除人與物之矛盾及人自身的矛盾，則應該改善政治工作與軍事教育，爲了消除人與人間的矛盾，則應該改善軍隊機構，消滅某些軍隊中的軍閥制度，求得官兵團結，軍民團結，及各軍間的團結，而這些團結，都須以國內民族團結，堅持抗戰，改良政治爲基礎。有了這種團結，減縮了我方的矛盾，就是孫子所說的「先爲不可勝」，然後才能利用敵人的矛盾，「以求敵之可勝」。

九 時間與空間

這裏要講的是「爭取時間爭取空間」只是爲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我們時常聽到說「爭取時間爭取空間」的重要，和「以空間換時間」的命題，有人說：「時間是中國之友」，有人說：「領土廣大是中國勝利的王牌」到底怎樣了解才對呢？

還在抗戰初起不久時候，一個奔逃異國的舊俄軍官 A-YakFonikov 在論『中國的機會』（原文見 China Today 四卷二號，譯文見「文摘」戰時旬刊八號）時說到『日本機構的弱點是它的經濟地位，和它的結果——內部情勢。自然它對這種重壓，可以支持某一個時期，即使各國對它施行經濟制裁。可是它絕不能支持到一個很長的時期，假如沒有外援的話。自然這就是說時間是日本之敵而為中國之友，危機的時間越長，日本獲勝利的機會就越少。』（注意點是我加上的——若）自然中國抗戰如能持久，顯然，對中國有利而對日本不利，然而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這裏姑且不問 Y 君當時的結論是要中國以游擊戰為主，實際等於要中國放棄正規戰，也不談 Y 君的全文，只問『時間是日本之敵而為中國之友』這一命題是否正確？我們認為這一命題只有片面的真理，如果把它絕對化起來，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坐待日寇之滅亡。試問時間本身就能為中國產生抗戰力量嗎？時間一定不利於攻者而有利於防者嗎？克勞什維茲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中曾說過：『當然國家由於歷次的被打擊，以致失敗的例子，即本來應該是防禦者的護國天使的「時間」，對於防禦者反生有害

的作用的例子，也並不是沒有。但是攻擊者的意圖，因為行動遲延以致完全失敗的實例也是非常之多的。可見戰爭之持久，不一定對防禦者完全有利，也不一定對攻者完全有害；不一定是防者之友，也不一定是攻者之敵。因為「時間」本身並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我們神聖的抗戰中，有些軍隊削弱了。有些軍隊擴大加強了，時間對它們都是一樣的。例如在華北之鹿鍾麟張蔭梧等部在敵人『掃蕩』中支持不住被掃垮了。因為他們不打敵人，專事反共，欺壓人民，壓迫士兵，結果，自然只有瓦解。同樣在那裏堅持艱苦抗戰的八路軍，出發時只有三個師十二團人（還留一部在後方）。而現在卻能進行「百團大戰」。一方消失抗戰力量，一方增長抗戰力量，還不都在這些年份嗎？可見我們不能坐着等「時間」先生送我們的抗戰力量來。

我們知道時間本身不能產生或消失任何東西，但任何東西的產生或消滅，都必定在一定的時間經過裏。時間對我國抗戰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洗刷腐敗的反動的勢力，培養新生的進步的勢力，準備反攻力量，轉弱為強，反敗為勝，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鬥爭與締造的時間；然而時間本身不能生出抗戰

力量，只有中國廣大的人民與軍隊才能生出它們。而要在人民與軍隊中生長抗戰力量，只有堅持抗戰，加強團結，改良政治，打擊親日派漢奸的勢力，限制頑固派反進步的勢力，而發展抗戰派進步的勢力，才能做到。

有些人天天在喊「爭取時間」，他們並不是在這爭取的時間中積極地「自力更生」來培養抗戰的進步力量，而是等待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外國的援助。他們的爭取時間，不是爲了在這時間中力求進步，而是拖延時間，維持與保留舊的一套。他們在所爭取的時間中也要發展力量，但不是發展抗戰的進步的民主的力量，而是發展妥協的頑固的反動的力量，並且還要打擊進步的堅決抗戰的力量。最壞的還有親日派的陰謀家，陰謀在這些時間裏發動反共戰爭；以代替與取消抗戰，以達成他們原來就要投降的目的。因此「爭取時間」這一抽象的口號下，隱藏着極不相同的內容：一種是爲了中國民族與人民之解放而求發展抗日的民主的進步勢力；一種是爲了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少數人的專政，而求發展反動的勢力；又一種則是爲了陰謀破壞團結，終止抗戰，實現投降而求發展親日的漢奸的勢力。我們應該看個清楚。

在戰術上時間的因素亦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知道無論新舊原則，都注重集中兵力於主要方向，那些被人橫的各個擊破或縱的各個擊破的軍隊，就是因為力量分散於空間或時間的隔離中。很顯然的，總數較多的軍隊，如果分散於各地，或以不同的時間到達一地，就很可能被總數較少而集中力量的軍隊（假定質量略等）所各個擊破。遭遇戰「雙突破」與「閃擊戰」中時間因素之作用更為明顯。

在空間問題上，有個德國的所謂「名記者」W. Schenke 在「論日本戰略」（原文見一月號亞美月刊，譯文見「反攻」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中，重複的着重地指出中國戰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靠地理因素即領土之廣大，他說日本之不能速勝，是忽視了這一點。他說：『地理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條件。』另外一個美國的所謂「遠東通」歐文·拉特模（Owen Lattimore），他在『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一文中，把中國畫個三角形，由西北的蘭州到東北的山海關，與由西北的蘭州到西南的滇越交界處為垂與底，把東北到西南的沿海線拉直為斜邊，他認為日本的失算在於未能貫徹一年前的計劃，『……先控制三角

形的北方之線（按即指華北）再趨直角，然後從北方和西方（按即指陝甘寧）征服四川。」（譯文見「文摘戰時旬刊」四十三號）他認為中國歷代的戰爭，都是這樣打，才取得勝利的。這位「遠東通」對中國的歷史，似還未全「通」，或是他忘記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光復，與北伐軍之勝利，並不是這樣打的。他這種「小小的幾何癖」，實由於不了解「在大多數場合，國家最好的鎖鑰，就在敵人軍隊裏面」。 (克勞什維茲「戰爭論」二十三章，經列寧摘入哲學筆記內，並批了「妙極！妙極！」等字，譯文見「抗日戰爭參考叢書」第五種「列寧讀戰爭論筆記」)

對於空間的了解，我們認為空間與時間是分不開的，同是戰力存在與戰爭運動的形式與必要條件。沒有時間的空間與沒有空間的時間是不可想像的。沒有時間與空間進行戰爭也是不可設想的。假如把中國領土全部失掉，去借外國領土來抗戰的事情，顯然是不可能。中國抗戰必須在中國領土內行之，因此保衛國土，成爲我們全民族的神聖任務。雖然「在敵國領土上來保衛本國的領土也是可能的」，（克勞什維茲「戰爭論」，蘇聯之在卡累利亞的戰爭正是這樣）

但在中日戰爭的具體情況中，這種可能早也沒有。中國有廣大的領土，這一「地理因素」便宜於中國的持久抗戰，並使敵軍愈深入愈分散愈暴露弱點，使中國愈易於轉弱爲強轉守爲攻，這是重要的條件，這與盧森堡等國不同。然而如果過去三年中我們不堅持抗戰，那末廣大的領土又於戰爭何益呢？中國領土廣大的條件，早已存在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利用這一條件。那種認爲中國戰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地理因素即領土之廣大的意見，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它將使我們放鬆了我們當前的政治任務，使我們對於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高壓，堅持民主的鬪爭放鬆，而去迷信那地理因素，這對於抗戰是有害的，所以也要批駁他。至於那種有「幾何癖」的「遠東通」，我們已指出他的意見早爲歷史事實所批駁，而且各時代的各種戰爭有各自的具體情形，那種唯心論的說法，用不着多去批駁它。

說到「以空間換時間」這一命題時，我們不免要回想到蘇聯十月革命後，紅軍亟需爭取時間休息、整頓以鞏固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國家時，對於對德議和的爭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列寧在蘇聯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了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所作的結論」。他說過：「梁尚諾夫同志偶然講了一句嚴正的話，這正好像十年一次的例外，祇足以證明一般一樣。他說：「列寧讓出空間以贏得時間。」這差不多是哲學的議論。這一次梁尚諾夫同志竟說出完全嚴正的詞句（雖然只是辭句），而全部實質，正在這個詞句中。我正要將空間讓給實際的戰勝者，以贏得時間。全部實質，就在這一點上，也只在這一點上。」（列寧選集第十三卷六十三頁）這一詞句的真實意義，在於戰略防禦者對強敵所不能不進行的「國內退兵」，我們在過去蘇維埃戰爭中所謂「誘敵深入」也與此相同。這被歷次的革命戰爭的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自然被放棄的一部空間也帶去了一部的時間，而且在被放棄的空間裏也放棄了一部力量。不過被放棄的這一部力量（人力物力財力等）是比較被保存的另一部的力量（主要是軍隊的力量，其次是未被放棄的另一部空間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小。爲了保存自己主要的力量不能不放棄一部次要的力量，以放棄一部次要的力量（「讓出空間」）來保存主要的力量，「贏得時間」整頓自己，尋求敵人弱點，以求最後勝利，就是這一詞句的真實內容。

我們知道「攻」「防」是軍隊進行戰爭的運動形態，時間與空間是軍隊（及一切戰爭力量）存在與攻防運動的形式，沒有時間空間則軍隊的存在與攻防運動的進行是不可設想的；然而如果沒有抗日軍隊與抗戰的攻防運動，則時間空間對中國民族的解放，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們說「爭取時間爭取空間」是爲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前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後者才是前者的目的。戰爭中「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是戰爭直接目的的兩方面，「消滅敵人」在戰爭中是主要的，非此即不能達到戰爭的目的。

「消滅敵人」與「保存自己」在不同條件下又互爲目的互爲手段。「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戰爭的本質戰爭的政治目的而有本質的不同，在中日戰爭中，中國抗戰是正義戰，「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保存自己」的目的是「保存自己」底民族的生存；而日寇的侵華戰爭卻是不義戰，其目的在滅亡中國獨霸東亞，從這一點上說，也可說它的「消滅敵人」的軍隊，是爲了「消滅敵人」的民族與國家，他的「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底民族生存，而是「保存自己」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政治。

在戰爭中有時「保存自己」的軍隊成爲主要的，例如當沒有「消滅敵人」的條件而有被敵人消滅或打擊的危險時，轉移兵力以「保存自己」，這是以時間與空間（以及那空間裏的人力物力）的部份放棄，來換取有利的作戰時機（有利的時間與空間），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也就是一時間的在一定空間中暫不「消滅敵人」求得「保存自己」準備將來更好地有利地或最後的「消滅敵人」。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放棄，決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時間與空間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戰力量（就是在部份被放棄領土上的人力物力財力等），不過這種被放棄的抗戰力量，較少較次要於被保存的抗戰力量而已。這也就是爲了抗戰的利益，犧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樣在戰爭中爲了「消滅敵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時的或是部份的。這種一時的部份的不「保存自己」，直接爲了當前的「消滅敵人」，間接爲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戰爭中一時的痛苦與犧牲，是應該忍受的。但，不應爲了少數人的便利，而應該爲了全民族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因此發國難財是要反對的，借口抗戰而壓迫人民是要

反對的，少數人的一黨專政應該結束，抗日的民主應該實現，在一定限度內改善民生以利抗戰，也是應該允許的。

爲了「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這種「保存」不僅只有消極「保存」的意義，而且還有、也應該有、必須有「擴大」與「加強」自己的意義；不如此，則不能轉變敵我力量與形勢，也就不能實現反攻與最後勝利。所以一切進步的力量在抗戰中應該發展，也必然發展。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抗日團體的發展與活動，廣大人民之覺醒，以及八路軍與新四軍擴大到五十萬，這是抗戰發展必然的結果，而且就在「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下，也是完全應該的。

十 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滲透與相互推移

這裏要講的是「敵我」「優劣」「攻防」「勝敗」之相互作用，相互滲透與相互推移。

我們已講過「攻防」是戰爭運動的基本形態，「時間空間」是這種運動的

必不可分離的形式；而「敵我」則爲此運動之物質內容，「優劣」則爲此內容之量與質的表現，「勝敗」則爲此運動之結果及矛盾之解決與推移。因此，我們可以說：「敵我」「優劣」「攻防」「勝敗」這四雙矛盾是戰爭中主要的對立範疇。「敵我」又可看爲根據，「優劣」又可看做條件。

由上所述，我們就可明白「攻防」這一運動，不能脫離「敵我」之「優劣」（所謂沒有無物質的運動），許多軍事家拚命去研究，並說明攻有那些利那些害，防有那些利那些害，自然這種研究與說明對於進行攻或防也不是沒有用處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爲其選擇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張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張防，那末這種意見就不免流入唯心論的錯誤中（曾國藩主張防，因「守可爲主」，蔡松坡主張攻，說「攻擊之利昭然若揭」）。其實在理論上主張攻或防，各有其時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階級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實戰中採取攻或採取防，則必視雙方力量之對比；力量優者採取攻，劣者採取防；劣者如採取攻必敗，優者如採取防則失機。

抗戰初期，淞滬戰役單純防禦的錯誤與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

之流毒，也是軍事上唯心論碰壁的最顯明的例子。照曾國藩的說法是：「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每喜爲主，不喜作客。」根據這種唯心論而且發揮它，說是：只要我們有精神，有勇氣，就可戰勝敵人的飛機大炮。說是：只要「鎮靜防禦」就可使敵人「一挫再竭」，「氣落志衰」。可是戰爭鐵面無私地教訓了這些唯心論者，而「鎮靜防禦」的結果，只是（也只能是）陣地成爲焦土，守軍全部犧牲。主要的因爲不懂得進行運動戰與積極的防禦（不是單純的防禦）。其實攻防應由敵我優劣決定，不由攻防利害之多少，也不由主氣與客氣之盛衰。至於攻防的方式，是陣地戰抑是運動戰，又要看敵我雙方各種條件而決定。

戰爭中攻防是運動的基本形態，進退只是攻防的準備或繼續。攻防二者是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關於這一點克勞維茲說過：「……守者爲對抗攻者之侵入計，宜調查其地方所有防禦手段，以預定其利用法，此又守者所以樹立抵抗上一般基礎之第一條件也。攻者見之，卽以爲決定第一攻擊配備之條件；

守者見此配備，又以之爲可以改定其防禦主義之條件。攻守兩勢，交相影響者如此。而此種交互作用，於新結果未生以前，陸續發生，循環無已。」（大戰學理第六卷第七章）

攻防二者交相作用，各以新的方法方式以對抗對方，「循環無已」，遂使戰法因之發展與進步，這就是戰爭內部辯證法地發展的規律；而攻防二者又因雙方的各種條件之聯結與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動着這一規律性的發展。這類例子，可以舉出很多。例如：在正規戰中，初期敵軍長驅直入，我國進行「線」的防禦配備，被敵突破一點，全線崩退，以後我國配備漸有縱深，於是敵又採取包圍與迂迴的辦法，這樣引起「延翼競爭」，到了我軍因延翼而減薄了縱深時，敵又進行突破，……（這僅說明正規戰中相互作用之一個側面）又如：在游擊戰中，初期敵軍向正面猛攻，後防空虛，於是我軍長驅入敵後，相繼收復許多縣城市鎮。隨後敵軍以正規戰法對我執行游擊戰任務的兵團圍攻，我軍則以「各個擊破」的方針，消滅敵軍於運動中。再後，敵以快速部隊兼用「游擊戰法」向我襲擊「掃蕩」，我則鞏固根據地，以民衆武裝的游擊戰，清野，破路

等配合基幹兵團之反「掃蕩」，在內線與外線之配合下，擊退敵人。再後，敵乃以築堡修路政策分割我根據地，以經濟封鎖與燒、殺、擄、掠來破壞我根據地內的人力、物力、財力，我軍則以更積極的更靈活的以至更大規模的交通戰與反「掃蕩」，打擊敵人，堅持敵後抗戰。最近敵軍對我根據地進攻之殘酷，已達空前未有之程度，燒、殺、擄、掠之慘，未有前聞。我軍分散游擊，密切配合羣衆，亦盡了堅持之能事。這也說明了攻防之相互作用，推進了雙方戰法，也加深了戰爭的殘酷性。正因為雙方作戰方法之交互作用，在戰爭中是「循環不已」的，因此我們不可滿意於自己的戰術技術，而應時時研究，日日進步。至於戰爭殘酷性之增加，則往往不易無止境的繼續到底，往往敵之兇焰最高之時，亦即敵之攻勢達到最高度或差不多達到最高度之時，因此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環境就會轉變，最後勝利就會到來。

這種攻防的交互作用，在克勞什維茲，似乎有點偏見。他認為引起戰爭行動具有先興性者是防禦，不是進攻，換句話說有防禦才有戰爭行動。他說：「防禦準備，以攻擊計劃為準，而攻擊配備，又以防禦之設計為基，固當然之事理

也。故欲決定攻守二者之中，果孰有先與性，不能僅藉攻守之比較研究，以求決定之理由，當從哲理上索隱鉤深，追求最初肇發戰爭行動之端緒者，而根據如此追求之結果，則不藉外力之助，自行肇發戰爭行動之端緒者，厥爲防禦。誠以攻擊之目的，在佔有諸物，而不在于戰。防禦之目的則明明在於戰鬪也。抵抗與戰鬪，究爲一行動，由此意義以推之，則防禦之目的，又不得不謂爲正在戰鬪。夫攻者不遇抵抗，即可不流血以達其目的，然則攻擊固非必然激發戰爭行動者矣。至於守者則惟直向攻者逞其行爲，故其行爲中，自含有抵抗之決志，即戰鬪之決志也。兩敵之對向相進也，要惟防禦行動，有以使然。故曰發動戰鬪素質於戰爭行動，具有先與性者，厥爲防禦。」（大戰學理第六卷第七章）

克氏這種偏見，我以爲是發於其唯心論基礎上的，他不從戰爭發展的客觀情形與客觀規律中去看問題，甚至忘記了他自己傑出的命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去分析引起戰爭的戰前的政治而從「哲理」上去「索隱鉤深」，因此就不免得出錯誤的結論來。這一錯誤的意見顯然爲侵略者張目。其實，雙方進

攻必定發生戰事，雙方防禦則戰事不至發生，這難道不是很顯明的道理嗎？並且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克氏亦還未完全說到。例如，在戰術上：防者之防禦配備是根據當時當地的敵軍力量態勢政治情況，過去的行動，現在的企圖之判斷，敵軍慣用的戰術，根據當地的地形居民情況，根據自己的任務兵力兵器資材、內部情況、友軍情況等等而決定。這一配備是沒有看到進攻之敵之部署前即決定的，但卻必須根據進攻之敵可能來進攻的方向與部署之判斷而定。攻者之進攻部署，則必須待到偵察明瞭敵方防禦配備之後才能具體地最後的決定。這就是說在戰術上從配備與部署上說，可以說先有防禦配備才有進攻部署。但是，在戰略上，如果攻者以敵國首都為目標，（過去侵略者的戰略進攻多以地區為作戰目標）則其戰略集中的地區與戰略進攻的路線，雖也根據已知的敵國之國防工事位置、敵國之地形、交通，以至民情出產等等而定，但其主攻方向、其兵力部署及其進攻時間，正可自由決定，且也不等到防者之配備完畢而後進攻。防者因其力量對比較劣的關係，在此時不能被動地依據攻者之部署而定出防禦計劃，以求從被動到主動，由防禦到反攻。這就是說在戰略上從配

備與部署上說，有時是先有進攻部署，才有防禦配備。這也就是說在攻防交互作用上，是「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了。有些時候，防者引起戰事的事情，不是不可設想的，例如一支軍隊前進抗敵，受到對方的阻攔（如過去我們先遣隊以至主力北上抗日之被阻攔，有些軍隊是向我們進攻，有些則僅取防禦和構成封鎖線）時，則戰爭是由防者引起的。反之，也有因防者防禦力量與設備之加強而使戰事消弭之事。例如蘇聯之堅持和平政策，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防禦力量，提出嚴防意外事變之警惕性，加強邊防，能使蘇聯超脫戰爭，不為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工具，也能使各帝國主義者不敢向蘇聯邊境窺竄。可見防禦並不一定引起戰爭。攻防二者之辯證的關聯，應從具體的戰爭情況中去觀察。

從一般情形上看，與其說防禦引起戰事，勿寧說進攻引起之為妥。而在戰爭發生的初期也是先有相互進攻的（如果以說進攻時），那時人類初有戰爭行動，先時只會使用工具來「進攻」（嚴格地說，那時只是相互衝突、格殺，尚無攻防之行動，打不過時只有跑，沒有防禦工具，也不會防禦），而後來才會使用工具來防禦，因而那時也只有「進攻」和「退却」，而無「防禦」（自然

退卻可以看作那時防禦的變形，而進攻中招架亦可看作防禦的因素。不過，那時（當無階級的原始共產制末期）的戰事，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戰爭有性質上的不同。那時戰事經過的時間極短，所以這種運動還未發生「攻」「防」二者的對立範疇，在我們所說的戰爭中攻防則是相互依存的對立範疇。此外，我們還可看到古代及中世紀的城牆，是防禦的東西，但不是城牆引起進攻與戰事，而是進攻與戰事引起城牆，這難道還不顯明嗎？

× × ×

上面我們說過了攻防以敵我優劣來決定，又說過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以下讓我們來說攻防之相互滲透與相互推移。

攻防二者不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而且二者還相互滲透與相互推移。機械論者不懂得防中可以有攻，於是採取單純的防禦；冒險主義者不懂得攻中也可有防，進中也可以退，於是不肯承認暫時的或局部的防禦與退却。那都是要不得的。我們認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在我國戰略防禦中有戰役進攻，在戰役進攻中又有戰鬪的進攻或防禦。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說：戰爭中，防禦

只是進攻的手段，沒有進攻不能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戰略防禦既不是戰爭全階段的東西，也不是抗戰戰略的全部，而只是一個階段一個部份，戰略防禦必須繼之以戰略反攻，才能完成戰略的目的。克勞什維茲論防禦時也說過：『最初自防護而返擊，有機可乘，即由反攻而攻擊之。』（大戰學理第六卷第一章第一節）。

正是因為對立物之有相互滲透，所以才有其內在的因素而引起相互推移。敵中有我（敵軍中，有同情我國抗戰反對其本國統治階級之侵略戰爭的反抗份子，有被迫或被誘的偽軍），所以在一定條件下，敵之一部可變為我（如敵兵之投誠，偽軍之反正。不過今天還只有一部敵變為我）。我中有敵（我抗日陣營中有暗藏的親日派、漢奸及其他奸細破壞份子等），所以我之一部有時亦可變為敵（如某些人員某些軍隊之叛變）。

優中有劣（敵強是敵優，但敵不義、國小、人少、內部困難、失道寡助，故優中有劣），如果劣的因素逐漸加多，優的因素逐漸削弱，則優可變為劣。劣中有優（我弱是我劣，但我正義、國大、人多、新興、多助，故劣中有優），

如果優的因素能逐漸增多，劣的因素能逐漸克服，則劣可變為優。

攻中有防（敵之戰略進攻中有戰役或戰鬥的防禦，全局進攻中有局部與一時的防禦），如迫使敵之防逐漸加多，攻逐漸減少，到一定程度時，則攻可變為防；防中有攻（我之戰略防禦中有戰役或戰鬥的進攻，全局防禦中有局部與一時的進攻），如能爭取我之攻逐漸加多，防逐漸減少，到一定程度時，則防可變為攻。

勝中有敗（在戰爭中敵之一時的勝利中，有過局部的失敗，有過並有着消耗與困難之加多，是勝中有敗），如敗之成份加多，勝之成份減少，則勝可轉為敗；敗中有勝（在戰爭中我之一時的失敗中，有過局部的勝利，有過並有着某些力量之加強，某些新的建設之產生，是敗中有勝），如勝之成份加多，敗之成份減少，所謂「積小勝為大勝」，則敗可轉為勝。

敵之「優」「攻」「勝」可變為「劣」「防」「敗」；我之「劣」「防」「敗」可變為「優」「攻」「勝」。這裏可變的基礎，在於敵之「優」中有「劣」、我之「劣」中有「優」的物質條件，（包括政治條件）而由可變到變，

由劣變到優，由防變到攻；最後，由暫時的失敗變到最後的勝利，則必須經過努力的工作與長期的鬪爭。必須加強敵偽軍工作，使敵中之我擴大；必須加強鋤奸工作使我中之敵消滅；必須加緊團結，改善政治，發揚人力物力財力，爭取國際援助，使我劣中之優加大；必須積極地組織戰役反攻，加強敵後游擊戰，使敵優中之劣加大，使敵攻中之防、勝中之敗加多，使我防中之攻、敗中之勝擴大；只有如此，才能轉弱為強，轉敗為勝。

所以說：鬪爭是發展的源泉。

十一 由戰略防禦到戰略反攻是戰力量變到戰略質變的鬪爭過程

這裏要說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只有我方戰力「量」之增加與敵方戰力「量」之減少，到一定程度時，我之戰略防禦才能轉為反攻。不耐煩或不積極努力於這種戰力「量」變的積累的，都要反對。

上面已說過由敵我、優劣、攻防、勝敗等對立物的相互滲透，到對立物的相互推移的發展，必須經過鬪爭的過程，這種鬪爭過程表現為由「敵我」「優

劣」量的不顯著的漸變，到戰略階段質的顯著的突變。這種發展的過程，不是空洞的公式，而必須有實際的內容；也不是只有量的發展循環無已的漸變，而是在一定條件下發生顯著的飛躍的質變。

發展的內容，是敵我優劣的戰爭力量之量與質，沒有這種戰力之「量」的增加，不能達到戰略階段之質的變化。因此在這裏我們一方面反對那種對於為戰力之量的增加所必要的設施採取消極態度、觀望態度、等待態度、以至反對態度的不進步的頑固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反對急躁不耐煩進行這種量變的積累，而空洞要求質變或自欺欺人地說現在已經到了戰略反攻時期那種自大狂妄的精神。爲了加緊這種量的生長、擴大、增加的積累，以求使質變（反攻）能更快地到來，則在全國範圍內：團結之加強，政治之改進，對親日派漢奸之打擊；在大後方：經濟之建設——特別是軍事工業及軍事交通，民衆之動員組織與武裝，軍隊之訓練，幹部之培養；在前線上：積極動作起來，爭取局部的戰役與戰鬥的勝利（那些對敵則採取消極避戰，對內則加緊反共的軍事進攻，是必須立即停止的），以及支援與加強敵後之游擊戰爭，……都是必要的事情。這些

都是救國的重要工作，這些工作都做得好，就算是我們進步了，我們能進步就能反攻，我們不進步，就不能反攻，我們進步得快，反攻到來也要快，我們進步得慢，反攻到來也要慢。我們全國人民，都像大旱之望甘雨地盼望着反攻之到來，與民族之解放，因此我們必須以一切力量求進步，以一切力量反對那些障礙進步的東西。

量變的過程是相當長期的，在一個大的質變未來之前，往往有許多小的質變，這種小的質變，也可以看做全過程的量變。爲要使全過程量之增加的變化加速，則領導者對此許多小的質變時機之把握，與推動其推移，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在每一這類小的質變關頭，往往會有另一相反力量，欲使運動往另一方向轉向，因此領導一不小心，則這種反動力量，因以獲勝，而抗戰運動隨之變質與失敗；領導正確則能克服危機，使運動向前發展一步。但是質變在社會現象上，其開始不一定是很明顯的，尤其是當質變條件快要成熟而尚未暴露之時，這種發現與把握，更屬難能，這正是全局掌舵者之能事。在抗戰過程中由戰略防禦到戰略反攻，由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從戰略指導的階段上看，也作

爲三個階段，即兩次的質變，從戰略性質上看，只有一次質變（由防禦到進攻），中間相持階段，只是質變的過渡時期，這一過渡時期是很長的，在戰略防禦之實未變到戰略反攻之質時，戰力的量變的積累，是這一質變的基礎。我們應努力做這一積累的工作。在這量變的過程中，遇到過還將遇到許多波折、許多危機，每一危機無論表現爲英美之遠東慕尼黑也罷，無論表現爲日寇誘降與德意勸降也罷，無論表現爲英美之引誘參加英美帝國主義集團也罷，無論是德意日陣線將發動新的攻勢而加緊對中國之壓力與親日派之加緊活動也罷，無論是美借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高彩烈，因而輕敵反共也罷，都曾經隨之而起一度一度的反共高潮，隨之是高壓政策，這也是抗日運動中進步力量與倒退力量發展的鬭爭，危機克服下去，則進步力量得發展（量變），時局換一局面（小的質變），而抗戰也向前進了一步（又是量變），倘在這些轉變的關頭，領導錯誤或因其他原因，也可能發生另一質變，進步力量受一打擊，抗戰倒退一步，甚至使抗日戰爭的本體發生壞的質變，變成非正義的戰爭，變成帝國主義戰爭中的附屬部份的不義戰（如反共戰爭）。自然也必然還存在着一部份正義的

戰爭，如一部份之繼續抗戰與討逆戰爭）。在運動發展過程中，這一類的關鍵的地方很多，都是領導者所應特別關心注目的地方，特別費力考慮計劃的時候。抗戰中基本的質變只有一次，但卻有兩個方向的質變，一個是隨着抗戰力量增加的積累，向抗戰運動「正」的方向變化的質變，即我軍之反攻到勝利；另一個是隨着投降力量增加的積累，向抗戰運動「反」的方向變化的質變，即直接投降，或間接投降，中止全局的抗日戰爭，使中國人民變成日寇的牛馬奴隸。正面的質變未到來的過程中，反面的質變在每時期都在威脅着我們，克服這些威脅，增加抗戰力量，是個長期艱苦的鬭爭，愈接近我們戰略的質變，愈接近我們最後的勝利時，則鬭爭愈見殘酷與困難，這是發展中常見之事。

量變是個長期的過程，質變也不完全是短期的或突然的變化。質變也有其經過的時期，有時時間是很長的，方式是複雜的，進程是很曲折的，我們抗戰由戰略防禦到戰略反攻，也大體如此。但是我們有條件有把握走盡這曲折的道路，實現我們的反攻，取得最後的勝利。

十二 在判斷情況中辯證法方法的應用（舉例）

這裏要講的不是情況判斷的技術，而是情況判斷的方法，並且主要的只講對敵軍的判斷，根據個人的了解略述幾點如下：

（1）判斷情況的任務，在於發現敵之企圖及其可能的行動；因此情況的研究，要求從情況的表面深入到敵之直接企圖，從其直接企圖到其更遠大的企圖，到其戰役方針之發現，更進而到敵之戰略企圖、政治目的。

（2）研究情況應用客觀的態度觀察問題。不可先入為主，不可自作聰明。根據一定時間空間條件下，雙方的力量的對比，及已知敵人的行動、判斷敵人可能的行動，不可妄替敵人設想，不可妄冀敵人適合我之企謀。敵人行動可能有多種方案，應計算他採取最好的方案，假設自己將遇到最大的困難。抗戰初期我國不顧敵我力量之對比，企圖反攻太原，結果反失臨汾。今（一九四〇年）年五月間，豫鄂初捷時候，陳誠就武斷的說：此次勝利更確證日寇在軍事上已至開始崩潰之時期，此後必無力再行大規模之進攻……」（五月十九日重慶各

報）但會幾何時？塞宜之敗，接踵隨之。最近又有人說：「倭國……一等國的地位，經我三年堅持抵抗已降爲二三等國家，……即歐戰爆發，亦無乘機漁利發言威脅的力量。」（劉斐「抗戰三年來之敵我戰略」）但德意日三國同盟不久簽訂，日軍之集中越南東京區及海南島台灣等地，亦有數師團之多，日寇積極南進的佈置並未中止，而我大後方亦還有被敵軍新進攻之可能，而對敵後之「掃蕩」則反而加緊。因此唯心的判斷只有碰壁。

(3) 研究情況應全面的看到各種各樣情況及其相互關聯。不可片面地只看到一方面，不可孤立地看各個情況而無視其相互關係。看到敵人的軍事進攻時，還要看到敵之政治誘降與經濟破壞之配合；看到敵之陸軍動作時，還應看到其空軍海軍之使用；看到正面情況不要忘了翼側與後方；看到今天情況時不要忘了昨天與前天；看到敵情我軍情況時，還要估計地形條件及天候影響；看到戰鬪要求時，還要看到政治影響與戰略戰役要求；看到敵人的弱點時，不可忘記敵之強處；看到敵人組織力量時，也要看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與困難；要看到敵人的失敗，也要看到敵人挽救與掙扎之可能；看到自己優點時不可忘記了

自己的缺點。過份估計敵之強處我之弱點，就會走到悲觀失望毫無辦法；過份估計敵之弱點我之強處，就會走到輕敵冒險、自招失敗。正確的適當的全面的估計，並權衡其中的輕重，抓住主要的關鍵，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與決心，如果有利有弊，陳說多端，而不辯輕重，則莫衷一是，料而不斷，反誤戎機。

(4) 研究情況應把敵人看成能動的、可動的，把情況看成發展的、變化的，不要看成固定的靜止的，敵人今天這個時候在這裏，明天那個時候就會不在這裏了，前天在這裏昨天在這裏今天在這裏，明天可能使他不能不離開這裏。看成動的還不夠，還要看它動的方向。爲此，就必須先知道敵人過去的行動，了解其行動的規律，以此推斷它可能的行動，並促使其行動。游擊戰與運動戰之調動敵人於運動中給我們打擊，正是從了解敵人可能的行動而誘使之行動中取得的。不懂這一點，永遠不會打連動戰，也得不到勝利。懂得了這一點，還要時刻注視着，敵人可能因累次受我打擊而改變其行動規律，因而我們也必須隨時應其變化而採取新的辦法。

(5) 研究情況應看到敵軍內部與外部的種種矛盾的鬭爭及其發展——日寇

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戰爭擴大持久與財政資材支絀的矛盾，軍閥之窮兵黷武與士兵厭戰反戰的矛盾，日軍與偽軍之矛盾，敵寇與我國人民之矛盾，德意日集團與英美集團之矛盾，日寇與其盟友德意間的矛盾，敵軍與我軍之矛盾，以及前面所說戰鬥力中之諸種矛盾，……這些矛盾的鬭爭及其展開，就構成各種各樣的情況。而這些交綜錯雜的矛盾，展開了諸種不同的方向，但又必從屬於敵國侵華滅華政策的總方向總方針。

(6) 研究情況時應看到敵軍在戰爭中各種手段方法方式的相互關聯與相互推移並產生許多新的方法方式，這些方法方式在戰爭中是無窮盡的。主要的作戰方向，可變為次要的，次要的也可變為主要的。以地區為作戰目標，可變為以軍隊為作戰目標，以軍隊為作戰目標，也可變為以地區為作戰目標（過去敵軍之進攻太原南京徐州武漢皆以地區為主要的作戰目標，最近敵之進攻襄宜地區及大洪山之國軍則是以野戰軍為主要的進攻目標，將來這種趨勢還會加大）；有時軍事進攻為主，有時又可變為政治誘降為主，在以政治誘降為主以後，也可再變為以軍事進攻為主；急進可變為緩攻，緩攻也可變為急進；包圍迂迴可

變爲突破，突破也可變爲包圍迂迴，圍攻可變成「掃蕩」；快速部隊的急進，可變成築堡修路的緩攻；過去先修路後築堡，現在先築堡後修路；過去燒殺擄掠與欺騙都用過，現在敵人的「掃蕩」採取毀滅政策，見人殺盡，見屋燒平，見物搶光。這些敵人進攻的手段是多種多樣變化無窮的，我們應隨時研究它。

(7) 研究情況時應把分析與綜合的方法結合起來。各種情況的詳細分析，要和這些情況的綜合總結與歸納結合起來。在分析具體的個別情況時，應注意到日寇的侵略政策與戰略戰術的根基；在推測敵人的企圖與行動時，也不可忽視了當前具體的情況。

(8) 研究情況時應該從同時存在的情況中看出其相互關係，從先後發現的情況中看出其因果關聯，又從各個規律性中看出其一般規律性，即敵人慣用的戰術。

(9) 研究情況時應記到沒有絕對重覆的情況，相對重覆的情況，都必定有其新的特徵，因此不可呆板應用過去的經驗。自己也不可老用一套的辦法去對

待敵人。

(10) 研究情況時應記到內容形式之鬭爭，內容決定形式，但形式又影響內容。一定的戰法是由一定的軍隊產生與表演的，因此軍隊如果改變了其質與量，其戰法亦將受到影響，其戰鬭力亦將隨之減弱或加強。敵軍人力逐漸的減弱將影響其戰法更加依靠火力與工事，而敵軍情緒之低落，與戰鬭力之減弱，亦可見敵軍內部困難之加多。

(11) 研究情況時，應看到量之增減與質之關係。敵軍量之不足，更易暴露其質之弱點，我軍量之優勢可以補救質之較差；如我軍質佔優勢，亦可以少勝多。

(結束語) 努力學習軍事爭取最後勝利！

史大林同志告訴我們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革命。』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說：『中國革命鬭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鬭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鬭爭……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武裝鬭爭之重要如此，而我們今天，身處民族革命戰爭的環境中，無論在前線、在敵後、在戰區、在大

後方，都離不開戰爭的空氣。無論我們做什麼革命工作都不能不以戰爭爲工作的重心，因此不懂得軍事，就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很好的進行，甚至還有性命的危險。因此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研究軍事理論，研究戰略戰術，研究政治工作，不可和緩。』蘇聯元帥鐵木辛哥在今年十月革命節頒佈命令中號召紅軍：『努力研究軍事，且宜善於利用目前戰爭之經驗。』對於我們也有號召的意義。

我們沒有學過軍事的同志更應該學習。對軍事的學習並不是一件難事，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說：『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中間有個距離，但不和萬里長城一樣，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幹革命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與使用不容易，是說學的澈底，使用純熟；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不難入。……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但到勝利之路，必須經過鬪爭——長

期艱苦的武裝鬭爭，及其他鬭爭之配合，我們要能從鬭爭中取得勝利，就必須懂得進行武裝鬭爭的方法，現在一切都具備了，就等着我們。因此我們應努力學習軍事。爭取最後勝利。

（此段載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之八路軍軍政雜誌三卷四期）

——全文完——

一九四〇年八月初稿。

一九四一年一月第一次修改。

一九四九年十月補註。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校正。